

CERI

长江教育研究院

Changjiang Edu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教育智库

Thinktanks

2025年08月刊

总第84期

贯彻落实、教育强国建设



CERI 长江教育研究院
Changjiang Edu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2025西安·长江教育论坛实录

2025西安·长江教

目录 *Contents*

2025 西安·长江教育论坛论坛实录

- 01** 2025 西安·长江教育论坛在陕西师范大学成功召开!
05 2025 西安·长江教育论坛

论坛主办单位简介

- 79** 长江教育研究院
80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82 陕西师范大学教师发展学院（陕西教师发展研究院）

84 论坛精彩回顾

85 《教育治理研究》征稿通知



欢迎与我们互动

2025 西安 · 长江教育论坛在陕西师范大学成功召开！



2025年7月1日，“2025 西安 · 长江教育论坛”在陕西师范大学雁塔校区逸夫楼二层报告厅举行。本届论坛由长江教育研究院、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陕西教师发展研究院共同举办。来自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西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宁夏大学、新疆师范大学、青海师范大学、四川师范大学、重庆师范大学、贵州师范大学、西藏民族大学、咸阳师范学院、海亮教育科技服务集团及 50 余所中小学、教研室的专家代表和陕西师范大学的师生代表近 200 人参加论坛。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部长李森教授主持开幕式。

论坛开幕式上，陕西师范大学副校长董治宝教授和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周洪宇教授分别致辞。董治宝表示，本次论坛广邀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共同探讨教育强国战略下的西部教育高质量发展，对进一步激发西部教育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具有重要意义。陕西师范大学在推进西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践

中，始终坚守师范院校主责，坚持学科建设为龙头，人才培养为核心，服务社会为导向，以实干为教育强国建设筑牢西部根基，努力为西部教育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周洪宇在致辞中谈到，在建设教育强国的战略背景下，推动西部教育高质量发展已成为破解区域教育失衡、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关键任务。本次论坛紧扣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与西部教育高质量发展研究主题，汇聚各方智慧，将有力推动教育学者持续关注教育领域前沿问题，通过政策研究与实践创新双轮驱动，为西部教育高质量发展构筑“理论 - 实践 - 政策”三位一体支撑体系，助力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



本次论坛共邀请 7 位专家学者做大会主旨报告。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主任袁振国教授以题为《数字化之于教育强国建设的决定性意义》、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周洪宇教授以题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纲领性文件——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解读》、首都师范大学孟繁华教授以题为《高质量人才培养的三个转化》、东北师范大学副校长邬志辉教授以题为《强国教育学与英才教育》、西南大学教育学部部长朱德全教授以题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中国道路”：“三教三融”协同逻辑》、南京师范大学劳动教育研究院院长顾建军教授以题为《工程技术人才培养体系建设与教育高质量发展》、华南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学院认知与技术研究室主任徐晓东教授以题为《以教育强国建设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围绕教育强国建设的实施推进，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解读和探讨，为西部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为推动教育现代化贡献了学术智慧。陕西省人民政府参事、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原院长司晓宏教授、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陈鹏教授主持报告。



下午专题报告环节，海亮教育科技服务集团党委书记李莉、华中师范大学人工智能教育学信息化与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付卫东教授、宁夏大学教育学院院长王安全教授、青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李晓华、重庆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院长冉亚辉教授、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院长朱晟利教授、新疆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马秀麟教授、贵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杜尚荣教授、西藏民族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许亚锋教授、咸阳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毛红芳教授、陕西省高校哲学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西部农村基础教育课程与教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赵丹教授等11位专家分享了对西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思考与实践。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部长马红亮教授、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冯用军教授分别主持报告。

闭幕式上，长江教育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李蓬在总结中指出，本次主题看似聚焦地域议题，实则承载国家战略使命。他高度评价了此次论坛取得的成果，并表示要继续深入贯彻落实《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为推动西部教育高质量发展、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2025 西安·长江教育论坛



论坛主题：贯彻落实《教育强国建设纲要（2024-2035年）》与西部教育高质量发展研究

论坛时间：2025年7月1日（星期二）

论坛地点：陕西师范大学雁塔校区逸夫楼二层报告厅

论坛开幕致辞

致辞嘉宾

董治宝 陕西师范大学副校长



各位专家学者、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上午好！盛夏时节，万物竞秀，我们在古都隆重举办 2025 西安长江教育论坛。我代表陕西师范大学，向参会的各位领导、嘉宾表示热烈欢迎，也向长期关心、支持学校发展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为我们描绘了宏伟的教育发展蓝图，明确了建设教育强国的目标任务和实施路径。本次论坛以“贯彻落实《教育强国建设纲要（2024-2035年）》与西部教育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广邀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共同探讨教育强国战略下的教育高质量发展，对进一步激发教育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具有重要意义。

陕西师范大学作为党和国家布局在西部地区的唯一一所部属师范大学，长期以来始终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积极投身西部教育事业。在推进西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中，我们以学科建设为龙头、以人才培养为核心、以服务社会为导向，一方面立足自身基础特色，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着力打造一流教师教育，聚力构建新的学科发展高峰，大力推进人才强校战略，在一流学科、特色学科等方面实现重大突破，综合实力迈上新台阶，为西部

教育发展提供了实践方案、贡献了智慧力量；另一方面，积极发挥部属师范大学“国家队”的示范引领作用，先后与中西部20余所高校建立对口支援关系，推进教育部师范院校协同提质计划，发起成立西部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创新与发展联盟，协同打造西部基础教育共同体，发挥特色优势，共享教育资源，共建发展平台。

在教育强国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学校特别重视教育学科建设，在资源配置、人才引进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教育学科去年在重大项目、重大人才、重大奖励等“三大工程”上取得历史性突破，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国际交流、社会服务再创佳绩，学科建设在发展过程中进步明显。

今天，站在教育强国建设的新征程上，我们更要坚持师范院校主责主业，发挥师范院校优势，以扎实成绩助力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希望各位专家学者、嘉宾朋友畅所欲言，贡献真知灼见，通过共同努力，推动西部教育事业不断迈上新台阶。最后，再次感谢大家对陕西师范大学发展的关注和支持，祝大家在古都西安工作顺利、交流愉快。

谢谢大家。

致辞嘉宾

周洪宇 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陕西师范大学全球治理与智库研究院院长



尊敬的董治宝副校长、袁振国主任、孟繁华副会长、邬志辉副校长、朱德全部长、顾建军院长、徐晓东主任，各位专家、各位老师，同学们：

大家上午好！在这充满活力与希望的盛夏时节，我们相聚在历史悠久的古都西安，共同举办 2025 西安·长江教育论坛。在此，我代表长江教育研究院向拨冗莅临的各位领导、专家学者致以最热烈的欢迎！向论坛主办方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陕西教师发展研究院致以最诚挚的谢意！感谢你们为全国教育工作者搭建起聚焦西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高端学术平台。

今年年初颁布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明确指出：“推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强化西部教育振兴，缩小区域教育差距”。这一纲领性文件为新时代西部教育改革锚定了坐标。在建设教育强国的战略背景下，推动西部教育高质量发展已成为破解区域教育失衡、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关键任务。其中，“构建西部教育资源协同工作机制”，正是破解西部教育资源薄弱、师资力量不足等问题、提升教育发展系统性的重要路径。

当前，我国教育发展面临着从“均衡布局”向“质量提升”的转型挑战，西部教育作为国家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水平直接关系到教育强国建设的整体进程。本次论坛紧扣“贯彻落实《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与西部教育高质量发展研究”主题，汇聚各方智慧，围绕西部教育中的系列问题展开研讨。我们期待通过思想碰撞与智慧交融，形成兼具前瞻性与实操性的西部教育发展范式，为教育行政部门提供政策制定的理论依据，为西部教育改革提供实践参考，为教育强国建设筑牢根基。

长江教育研究院自 2006 年成立以来，始终围绕理论创新、咨政建言、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公共外交这五大方面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在理论创新方面，一是组织编写出版《教育智库与教育治理研究丛书》（12 册）《全球教育治理研究丛书》（10 册）、《新时代教育治理与教育智库研究丛书》（10 册）《全球教育竞争力研究丛书》（10 册）《中国教育国际竞争力研究》、《中国省域与城市教育竞争力研究》、《中国教育黄皮书》（2010 年—2025 年）等系列图书，二是多年持续研制“年度中国教育政策建议书”“中国教育指数”“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指数”“中

国教育国际竞争力指数”“教育强国建设指数”等系列研究成果；在咨政建言方面，多年以来一直定期通过各种报送渠道向全国人大、教育部等相关部门报送研究专报和咨询快报。在舆论引导方面，每年发布“十大教育热点前瞻”、“年度十大教育盘点”、编写《<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政策研究与阐释》图书，这些内容为公众了解教育热点问题、深入了解国家相关政策提供了正向的引导；在社会服务方面，聚焦基础教育领域，积极开展生活实践教育；在公共外交方面，与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教育研究中心、加州州立大学中国教育研究所、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知名智库建立了紧密的联络渠道，通过开展学术交流、合作研究等加强了与国际的交流与合作。

2025年，我院持续深化开放合作机制：已与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联合举办了“北京长江教育论坛”，联合江苏大学举行了“镇江长江教育论坛”，与河南师范大学联合举办“新乡长江教育论坛”，今天，我们携手陕西师范大学联合举办“西安长江教育论坛”，接下来，我们将与四川师范大学联合举办“成都长江教育论坛”，与天津师范大学联合举办“天津长江教育论坛”，也将于11月中旬在北京举办第十届教育智库与教育治理50人圆桌论坛，我们期望各位专家学者继续支持。

未来，长江教育研究院将继续发挥自身优势，加强与各方的合作，共同推动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我们将继续发布年度教育政策建议书，出版年度教育研究报告，为我国的教育决策提供更多更有价值的参考。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教育领域的前沿问题，通过政策研究与实践创新双轮驱动，为西部教育高质量发展构筑“理论-实践-政策”三位一体的支撑体系，助力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

最后，再次向长期以来给予两院鼎力支持与信任的各位领导、专家致以崇高敬意！愿本次论坛成为思想激荡的学术盛宴，凝聚共识、启迪智慧，为西部教育振兴注入蓬勃动能。预祝论坛顺遂圆满！谢谢大家！

专家学者围绕论坛主旨作报告

报告嘉宾：袁振国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主任、教授

报告题目：《数字化之于教育强国建设的决定性意义》



尊敬的各位同仁：

大家好！在当今时代，人工智能与数字化浪潮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席卷而来，深刻改变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教育领域也不例外。人工智能时代作为数字化的高级阶段，已然到来，在此背景下，深入探讨数字化与教育的融合，对于我们建设教育强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接下来，我将从几个关键方面，与大家分享我对这一主题的思考。

一、澄清概念：“教育 + 人工智能”而非“人工智能 + 教育”

在人工智能与教育的关系上，“人工智能 +”这一概念，通常是指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特定场景，比如“人工智能 + 教育”，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用于教育场景，旨在加快、加强教育工作，并使其更加精准。然而，教育的本质绝非单纯追求速度、强度与精度。教育是一项以促进人的发展为核心的事业，其目标、过程与结果都有着独特的价值判断标准。因此，我特别强调，在人工智能与教育的关系中，应秉持“教育 + 人工智能”的理念，即以教育发展和人的发展为根本出发点，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来服务和优化教育，而非让教育去适应技术的应用逻辑。

二、开辟新赛道，塑造新优势

在数字化教育、人工智能教育的大背景下，我们常提及人工智能赋能教育，这无疑是正确的方向。但对于教育而言，其意义远不止于让现有教育工作做得更好，更关键的是要开辟新赛道，塑造新优势。唯有如此，我们才有可能在未来短短不到 10 年的时间内，实现建成教育强国的宏伟目标。在现有的条件、轨道以及体制框架下，达成这一目标困难重重，我们迫切需要新思想、新技术路线的引领。而当下人工智能的飞跃发展，恰恰为教育的革命性变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三、明确教育的价值导向和发展方向

在探讨教育数字化和教育数字化转型时，许多文章侧重于从技术角度、具体渠道和路线进行分析，这固然十分必要。但我们必须明确，教育作为育人的事业，与其他行业有着本质区别。教育的核心使命是促进人的发展，人工智能在其他领域的应用主要聚焦于领域本身，而教育则是通过人、依靠人来实现发展。因此，教育需要有明确且坚定的价值导向和发展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做出了高瞻远瞩的概括，即发展伴随每个人一生的教育，平等地面向每个人的教育、适合每个人的教育和更加开放的教育。这一论断切中了当下教育的薄弱环节，同时也为未来教育描绘了一幅令人憧憬的景象，体现了教育的终身化、个性化和更加开放的发展趋势。随着教育数字化和智能教育的不断发展，这些理念将逐步得以实现，为教育开辟新赛道、塑造新优势奠定坚实的基础。

四、教育数字化带来的革命性变化

教育数字化将给教育带来全方位的革命性变化，我将其概括为以下几个关键方面：

（一）重构知识新体系

当前，我们的学科体系和课程体系是在现代科学发展的背景下，特别是在培

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以及工业革命推动科学技术进步之后逐渐形成的。其发展路径与学科分化紧密相连，学科分化促进了科学知识的生产与发展。在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阶段，我们一直强调构建知识结构，形象地称之为“知识树”，即有主干、枝干、分支及繁茂的叶子，各学科在其中都有明确的定位。然而，这种知识体系是人类为了便于认识世界而抽象构建的，并非世界的本来面貌，因为现实世界中的各种现象是相互交织、难以简单分科的。

而人工智能的发展为知识体系带来了新的飞跃契机，即实现知识的综合化。语言大模型的出现让我们切实感受到了这种可能性。当我们使用语言大模型时，它并不区分问题所属的学科领域，而是对人类所有的信息和数据进行整合，从而有机地解答各种问题，这便是“全息”概念在知识领域的生动体现，如同大海中的每一滴水都蕴含着整个海洋的要素，从一滴水可洞察海洋的各种特征。

（二）构建知识传播的新通道

知识的生产是为了促进大家的成长与生活，其传播方式也在不断演变。从最初的口耳相传，到文字、书籍、报刊的出现，人类文明史至今，文字传播一直是知识分享的主要方式。但如今，一种崭新的景象正在形成，即语言、文字、图片、视频融为一体的新模态知识呈现方式和学习方式，为教育打开了全新的大门。目前，语言大模型虽仍以语言文字为基础，但语言与图片、视频之间相互转化的新技术已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可以预见，未来人类的学习方式必将是多模态的，知识的传播和学习将形成全新的多模态组合，这种组合并非简单叠加，而是构成了人类知识传播与获取的新状态。例如，文字在传播文明时往往消耗大量信息，而视频一秒钟所提供的信息可能远超一本书，这充分展示了多模态知识传播的强大优势。

（三）构建教学新范式

几千年来，人类教育模式的主要特点可概括为教师讲、学生听，教师是主动的知识传播者，学生是被动的接受者，学习目标主要是获取标准答案。尽管其间也存在互动，但从本质上讲，教师主导、学生被动接受的关系并未改变。然而，

这种传统教学方式正面临颠覆性挑战。如今，一部手机即可让我们瞬间获取所需的各类知识，个性化教育已触手可及。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教学方式和师生关系必然发生深刻变革。如果教师仍局限于传统的讲授模式，将难以在未来的教育舞台上立足。未来的师生关系将以学生的自主选择为出发点，教师将转变为引导者，共同构建新型的师生关系。

同时，人工智能为教育带来的最大变革之一，便是在大规模背景下实现个性化教育。现代教育的快速普及得益于班级授课制，它极大地提高了教育效率，使普及教育成为可能。但班级授课制也存在显著弊端，即标准化，所有人接受相同内容、难度、节奏和评价标准的教育，这与教育促进个体差异化发展的理想背道而驰。而人工智能与教育的深度融合，正如总书记所强调的，有望实现大规模的个性化教育。其技术原理基于 5G 环境的智能环境、基于知识图谱的智能题库、基于智能算法的智能评价，从而精准获得每个人的最近发展区。这一理念由苏联心理学家维果斯基提出，通过人工智能对个人的精准画像，我们能够确定其下一步发展的最理想目标，进而实现智能规划与智能推荐。虽然目前这仍处于理论探索阶段，但一旦实现，必将为教育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五、推进教育数字化的关键举措

在推进教育数字化的进程中，我们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一）确立以人为本的理念

推进教育数字化，首要的是确立以人为本的理念，我们的目标不是为了技术而技术，而是要始终将促进人的发展作为教育发展的核心目标。技术只是手段，人的成长与进步才是教育的终极追求。

（二）构建教育数字化环境

构建完善的教育数字化环境至关重要，这包括硬件设施的升级、软件资源的开发、平台建设以及系统整合。只有具备良好的基础环境，教育数字化才能得以有效实施。

（三）开辟教育新赛道，打造教育新场景

数字化、智能化在现有教育场景中难以实现重大突破，因此我们必须积极开辟教育新赛道，打造全新的教育场景，涵盖学习、教学、管理、评价以及教育数字化自身的治理等各个环节。通过创新场景，激发教育数字化的无限潜力。

（四）开发优质教育资源

数字化教育资源不应仅仅是线下资源的简单线上化，而应具备现代化、数字化的特点。理想的数字化资源应具有小颗粒（如1-3分钟的短视频）、多模态（融合语言、文字、声音、图片等多种形式）、互相关联（具备自主推荐和自主选择功能）等特性。例如，手机上丰富多样的资源因其符合这些特点而深受大众喜爱，我们应以此为方向，开发满足学生个性化需求的优质教育资源。

（五）培养教师人机系统能力

在教育数字化、智能化时代，教育场景中的人机系统至关重要，教师应具备相应的人机系统能力。人机系统可分为人机互动、人机融合、人机共创三个阶段。人机互动阶段，机器主要作为工具界面；人机融合阶段，强调线上线下的有机结合；而人机共创阶段，教师、学生与机器将形成全新的三元主体关系，每个人既是学习者，也是知识的提供者，教师的关键作用在于处理好本人、学习者与机器之间的关系，通过实体世界与虚拟世界的互动，实现教育的创新发展，促进学生个性化和批判性思维的培养。

综上所述，数字化在教育强国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决定性意义。我们应紧紧抓住这一历史机遇，积极推动教育数字化的深入发展，为实现教育强国的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

谢谢大家！

报告嘉宾：周洪宇 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陕西师范大学全球治理与智库研究院院长

报告题目：《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纲领性文件——〈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解读》



尊敬的各位同仁：

大家好！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战略要求和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总体目标。2023年5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教育强国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并对教育强国建设作出系统性部署，科学回答了教育强国建设的一系列重要问题。202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为什么建设教育强国”“建设什么样的教育强国”“怎样建设教育强国”等重大理论与实践命题，为建设教育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这是我国首个以教育强国为主题、引领教育事业发展的中长期战略规划，是新时代新征程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纲领性文件，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确保教育强国建设战略目标如期实现擘画了宏伟蓝图、明确了行动指南。

一、《纲要》颁布实施的时代背景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全方位深层次加速演进，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向前推进，教育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地位作用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作为

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提升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教育已成为国家利益和目标的中心。这种深刻变化对教育发展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纲要》是党中央、国务院站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深刻把握国家战略利益和目标变化，立足国内国际形势和我国教育发展实际，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任务制定的重大决策部署。要从世情、国情、教情三个方面来准确把握《纲要》颁布实施的时代背景。

从世情看，国际形势呈现着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的深层变动，深刻影响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一是全球气候变化、东西文明变化等长时段变迁，深刻影响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与衰退；二是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科技革命蓄势待发等衍生出的人口、技术、制度层面的中时段变局，使人类社会的发展面临巨大的挑战和机遇；三是国际政治剧烈变动和全球债务问题等短时段变化使国际局势充满不确定性。三个方面因素的叠加，使得国际竞争日益激烈。而国际竞争的本质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其核心是科技和人才的竞争，科技与人才的竞争归根结底要靠教育。

从国情看，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过长期奋斗，我们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人民得以站在更高的历史起点上向着未来前进，随着全国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960多万贫困人口实现易地搬迁，我国实现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脱贫成就，打赢了世界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这一难题。与此同时，经过长期努力，我们党领导人民探索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道路，社会发展的总体上升趋势不可阻挡。目前，我国处于向着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前进的新发展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推进改革发展、调整利益关系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建成教育强国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愿望，必须扎实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更好发挥教育强国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

从教情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把教育作为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推动教育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格局性变化，为建成教育强国奠定了坚实基础。新时代以来，我国各级各类教育均取得了长足进步。2012—2023年间，

学前教育毛入园率从 64.5% 增长到 91.1%，学前教育进入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新阶段；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从 91.8% 提高到 95.7%，义务教育发展从基本均衡向优质均衡迈进；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从 85.0% 提高到 91.8%，高中教育优质特色发展取得新进展；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 30% 提高到 60.2%，研究生在学人数从 171.98 万人增加到 388.29 万人，“双一流”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高等教育在规模和质量两方面均获得跨越式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与此同时，教育事业发展离强国建设、民族复兴需要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还有差距，如教育对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贡献度有待加强，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仍需提升，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创新有待加强，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不足和分配不均，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体系亟待健全等问题，需要我们紧扣中央关心、群众关切、社会关注，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和效果导向，高起点布局、高质量推进教育强国建设。

二、《纲要》颁布实施的重大意义

教育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之基。世界强国无一不是教育强国，教育始终是强国兴起的关键因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成教育强国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愿望，是实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先导任务、坚实基础、战略支撑。”《纲要》是党中央、国务院围绕教育强国建设主题，颁布实施的重大战略，体现了我们党团结带领全体人民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奋斗的历史主动。《纲要》是新时代新征程党中央、国务院颁布实施的教育事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明确了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战略目标和行动路径。不仅体现了国家对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提出了教育事业发展的战略目标，而且立足中国实际，谋划了建成教育强国的行动路径。《纲要》的颁布实施，是适应新时代新征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情况，对教育事业作出的总体安排和全面部署。这是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的行动指南，引领着我国教育向着更加公平、优质、创新的方向迈进。

《纲要》是首个以全面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为重要任务的国家教育行动计划，深刻体现了国家战略需求对教育发展的引领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

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纲要》围绕全面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重要任务，提出了一系列创新举措，能够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纲要》是全面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统筹发展、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顶层制度设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教育、科技、人才一体统筹发展，是党的二十大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纲要》进一步强调了构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统筹推进机制，通过深化教育改革创新，健全新型举国体制，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及创新链的有机衔接，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这一顶层制度的实施，将有力推动创新成为国家发展的基础驱动，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纲要》的颁布实施是实现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愿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大战略举措。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教育强国，是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要促进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纲要》基于教育的人民属性，着眼于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出了一系列促进教育公平与提升教育质量的政策措施。这一战略举措的实施，将有力推动我国教育事业的均衡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让教育成为人民美好生活的基石。

《纲要》对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重大部署，更好发挥教育强国建设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中的作用，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它明确了新时代教育强国建设的战略目标和重点任务，强调通过深化教育改革创新，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支撑。这一纲领性文件的实施，将有力推动我国教育事业迈向新台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三、《纲要》颁布实施的总体要求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关于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战略部署，实现 2035 年建成教育强国的战略目标，《纲要》明确了教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要求，包括指导思想、工作原则和主要目标三个方面。

首先，在指导思想方面，《纲要》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明确了“四个全面、两个加快”的战略要求。“四个全面”即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全面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两个加快”即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加快建设具有强大思政引领力、人才竞争力、科技支撑力、民生保障力、社会协同力、国际影响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指导思想突出强调教育的“三大属性”和教育强国的“六大特质”，体现了对“什么是教育”“什么是教育强国”的规律性认识。我们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结合新时代教育强国建设伟大实践，深刻把握教育强国建设的基本规律，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

其次，在工作原则方面，《纲要》强调：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突出促进公平、提高质量，强化战略引领、支撑发展，深化改革创新、协同融合，坚持自主自信、胸怀天下，这是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方法论。正确处理“五个重大关系”、全面构建“八大体系”等要以此为基本原则。“五个重大关系”为：支撑国家战略和满足民生需求的关系、知识学习和全面发展的关系、培养人才和满足社会需要的关系、规范有序和激发活力的关系、扎根中国大地和借鉴国际经验的关系；“八大体系”为：全面构建固本铸魂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创新牵引的科技支撑体系、素质精良的教师队伍体系、开放互鉴的国际合作体系。《纲要》以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为根本保证，以正确处理“五个重大关系”为关键要求，以“八大体系”为基本结构，确定了教育强国建设的“四梁八柱”。

再次，在主要目标方面，《纲要》坚持近期目标和中长期目标相结合，分2027年和2035年“两步走”实现建成教育强国的战略目标。第一步是面向开局的起步阶段，重点是全方位打牢教育强国建设基础。《纲要》明确到2027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效。各级教育普及水平持续巩固提升，高质量教育体

系初步形成，人民群众教育获得感明显提升，人才自主培养质量全面提高，拔尖创新人才不断涌现，关键领域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教育布局结构与经济社会和人口高质量发展需求更加契合，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教育中心建设迈上新台阶。第二步是面向中长期，深化重大战略布局，确保如期建成教育强国。《纲要》明确到2035年，党对教育事业全面领导的制度体系和工作机制系统完备，高质量教育体系全面建成，基础教育普及水平和质量稳居世界前列，学习型社会全面形成，人民群众教育满意度显著跃升，教育服务国家战略的能力显著跃升，教育现代化总体实现。

总之，《纲要》紧紧围绕教育的“三大属性”，以“六大特质”为主要特征，以“八大体系”为基本结构，以正确处理“五个重大关系”为关键要求，将深化改革贯穿全文，突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统筹部署，推动我国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的系统跃升。

四、《纲要》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的关键任务

面向未来，《纲要》部署了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的战略任务，包含九个方面，分别对应思政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职业教育、终身教育、教师队伍建设、教育综合改革和教育对外开放。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全面贯彻落实《纲要》部署的一系列重大战略任务，立足大局全局，精准把握《纲要》中的关键任务，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一，锚定实施立德树人工程重大任务，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立德树人关乎党的事业后继有人，关乎国家的未来和命运，是建设教育强国的核心课题。《纲要》部署了九方面重点任务，首要任务便是“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换言之，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是教育强国建设的首要工程。实施《纲要》，应着眼教育的政治属性，持续推动构建立德树人新格局，坚持“五育”并举，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确保我们培养的时代新人始终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

第二，锚定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深入推动教育、科技、人才良性互动。科技创新是国家发展的核心动力，而教育则是培养科技人才的重要基础。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浪潮下，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协同发展意义愈发重大，作用愈发凸显。要从战略上把握落实的路径，把握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的内在规律性，加强科教融汇、产教融合、产学研一体化。

第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持续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始终是不可或缺的任务。我们所追求的教育强国，核心在于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需结合《纲要》部署，聚焦解决人民群众迫切关心的教育问题，突出促进教育公平，全面提高教育质量。一是要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二是要深入实施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工程，探索逐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三是要进一步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有序推进中考改革；四是要促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和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深化高考综合改革；五是要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

第四，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用好试点抓落实。从教育大国到教育强国是一个系统性跃升和质变，改革始终是发展教育事业的核心动力。一方面，随着教育发展水平的提升、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持续推进及未来国际竞争合作态势的演变，单一的教育改革已经无法满足中国教育自身发展的需要，必须采取综合性、集成性的教育改革；另一方面，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全面提升教育质量与治理效率，必然要求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教育综合改革对于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无疑起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在这一过程中，应树立科学的质量观、发展观和评价观，加强教育强国建设的监测评价。

五、《纲要》实施落实的组织保障

建设教育强国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任务。《纲要》对建设教育强国提出了一系列顶层制度安排，需要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信心、

久久为功，加强组织实施。《纲要》第十一部分专门强调“加强组织实施”并就建设教育强国提出了一系列制度性要求，为教育强国建设战略规划的实施提供了组织保障。

第一，完善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部门各负其责的教育领导体制。《纲要》强调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这就要求牢牢掌握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权，不断夯实教育强国建设的政治根基。确保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要坚持党委统一领导，推进党政齐抓共管，严格要求各部门各司其职，完善教育领导体制。要健全教育系统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制度体系，切实加强对教育工作的顶层设计和统筹谋划。

第二，全面推进各级各类学校党的建设，维护教育系统政治安全与和谐稳定。加强党的领导，基层组织是基石。《纲要》要求全面推进各级各类学校党的建设，牢牢掌握党对学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将党风政风、师德师风、校风学风建设作为评价学校领导班子办学治校水平的重要内容。

第三，充分发挥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的作用。2018年2月28日，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强调要加强党对涉及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重大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教育工作位列16个“涉及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重大工作”之中。随着《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的颁布，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开始担负起引领新时代教育工作的历史性任务。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负责重大教育事项的顶层设计、总体布局、统筹协调、整体推进，为新时代我们党引领教育事业全方位前行保驾护航。因此，《纲要》要求充分发挥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的作用，推动解决教育强国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加强教育强国建设的监测评价。

第四，各级党委政府要切实扛起教育强国建设的政治责任。如今，教育强国建设进入冲刺期，教育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点作用更加显著。要把建设教育强国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来抓，牢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落实建设教育强国这一国家意志，严格执行党中央对于教育强国的顶层设计。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心怀“国之大者”，关心关注教育，解决教育强国建设中的重要问题。

第五，要营造全社会共同关心支持教育强国建设的良好环境。教育是人人关心的事业，关系着千家万户。贯彻实施《纲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要构建多方参与的教育生态共同体，凝聚社会各方的智慧和力量，为教育强国建设汇聚中国力量。《纲要》强调建立政府主导的家校社协同的育人机制，这就要求我们创新传播方式，建立立体化的宣传机制，形成全社会尊师重教、合力兴教的生动局面。

学思践悟，知行合一。贯彻落实《纲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教育系统的中心任务。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把全面实施《纲要》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结合起来，围绕谋划实施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这条主线，做有理想、负责任的行动主义者，切实增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加强教育政策的学理阐释，将政策文本转化为具有生命力的教育实践，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报告嘉宾：孟繁华 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报告题目：《高质量人才培养的三个转化》

尊敬的各位同仁：

大家好！我将从三个方面来阐释我的观点。

（一）成长观革新：从“选拔淘汰”到“包容发展”

传统英才教育模式在实践中逐渐显露出深层弊端：过度强调“筛选式培养”，往往将学生置于“非优即汰”的竞争框架中，不仅存在“重智育轻德育”的价



值偏差，更因“天才班”“少年班”等隔离式培养模式，导致学生社会性发展脱节。例如部分试点班级因长期脱离同龄群体，出现人际交往能力弱化、集体意识淡薄等问题，与全面发展的教育目标相悖。

《纲要》提出的“融合式英才教育”，正是对这一困境的针对性破解。其核心在于通过三重融合重构培养生态：课程融合以跨学科项目制学习为载体，如某中学将物理实验与乡村水利调研结合，让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中整合知识；生活融合通过打破“特殊班级”物理隔离，将英才培养融入常规校园生活，促进多元特质学生的社会化成长；资源融合则依托高校实验室、科研院所项目资源，建立“双导师制”，如某高校与地方中学合作，由教授与中学教师共同指导学生开展科创课题。

为保障这一模式落地，建议按在校生5%的比例设立专项经费，重点支持“脑矿资源”开发研究——通过神经科学技术（如认知负荷监测、学习偏好图谱分析）精准识别学生的潜能特质，避免因传统评价体系的片面性而埋没“偏才”“怪才”。例如某实验校通过脑科学评估发现，一名数学成绩平平的学生在空间建模方面具有超常天赋，经定制化培养后获国际科创大奖，印证了包容发展理念的实践价值。

（二）知识转化：从“信息囤积”到“智慧生成”

PISA 测试成绩的波动（2012 年全球第一，2015 年后逐步下滑），表面是学业表现的起伏，深层反映出传统教育中“信息积累”与“能力生成”的割裂。部分学校为追求分数，将教学异化为“知识点背诵 + 解题技巧训练”的机械过程，导致学生虽掌握海量信息，却缺乏运用知识解决复杂问题的智慧——这正是“转识成智”路径重构的迫切性所在。

重构路径需双轨并行：在思维训练层面，应将“批判性思维”课程纳入中小学必修课体系，构建“质疑—论证—反思”的三阶教学模式。例如某小学设计“校园垃圾分类优化方案”课题，引导学生通过数据调研、方案设计、成本核算等环节，培养跨学科问题解决能力，并建立包含“逻辑严密性”“创新视角”“可行性分析”等维度的评价体系。

在实践导向层面，推动高校与龙头企业共建“概念验证中心”是关键举措。这类中心既非单纯的科研机构，也非传统教学平台，而是聚焦“实验室成果到教学案例”的转化枢纽。如某高校人工智能实验室与科技企业合作，将“智能语音识别”技术研发过程拆解为中学信息技术课的项目案例，学生不仅学习原理，更参与简化版算法优化，实现“从科研实践到教学应用”的闭环。

（三）教育生态：从“标准化生产”到“个性化生长”

过度标准化的教育模式，如同工业流水线的“批量生产”，在统一课程、统一进度、统一评价的框架下，学生的个性差异被抹平，创造力被压制——某教育调研显示，超过68%的教师承认“为赶教学进度，不得不忽视学生的个性化疑问”，这正是《纲要》明确“反对过度标准化”的现实背景。

破局需从两方面发力：在学科布局上，新增与国家战略需求匹配的专业（如人工智能、量子信息），并非盲目跟风，而是基于产业人才缺口的精准布局。以人工智能专业为例，某高校结合当地智能制造产业特点，开设“工业机器人视觉识别”方向，实现专业设置与区域经济的深度绑定；而淘汰连续三年就业率低于60%的专业，是为避免教育资源浪费，某省对“传统纺织工艺”专业的调整，正是通过关停低效专业，将资源转向“现代纺织材料研发”等新兴方向。

在教学模式上，“云端学校”的推广为个性化生长提供了技术支撑。某偏远地区通过5G网络链接城市名校资源，结合AI学情分析系统，为每名学生成“知识图谱+学习路径”的个性化方案：基础薄弱生侧重知识点补漏，配备一对一在线辅导；学有余力者则接入拓展课程，参与跨校研学项目。这种“一人一课表”的模式，既破解了班级授课制的同质化难题，又通过技术赋能让教育公平在个性化发展中落地生根。

报告嘉宾：邬志辉 东北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

报告题目：《强国教育学与英才教育》



尊敬的各位同仁：

大家好！

（一）构建自主教育学知识体系

我国教育研究领域长期存在的“西方理论依赖症”，在实践中呈现出多重显性特征：部分学术研究习惯于以西方教育理论为“元框架”，将中国教育实践作为“验证样本”，导致研究成果陷入“水土不服”的困境。例如在基础教育阶段，某些借鉴西方“精英教育筛选模型”设计的课题，因忽视我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制度语境，最终在国家级成果奖评审中因“中国特色不足”被否决。这种现象暴露出教育理论建构中“主体性缺失”的深层问题——脱离本土土壤的理论移植，既无法解释中国教育改革的独特逻辑，更难以指导实践突破。

构建“强国教育学”正是破解这一困境的核心路径，其核心要义体现为“包容性”与“自主性”的辩证统一。包容性并非简单照搬，而是在比较借鉴中实现创造性转化：以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为例，我国在引入时并非复制其“企业主导培训”模式，而是结合产业结构特点，创新出“职教集团+产业园区”的本土化形态——某省将汽车制造企业的生产车间转化为职业院校实训基地，既保留了“工学结合”的核心优势，又适应了我国制造业集群化发展的现实需求。

自主性则聚焦本土问题的理论突破。以“双减”政策为例，不同于西方“教育减负”的单一维度，我国政策设计既包含减轻学业负担的表层目标，更蕴含“重

构教育生态”的深层考量：某调研显示，政策实施后，78%的小学增加了体育活动时间，63%的初中开设了劳动教育课程，这种“减负——提质”的联动效应，为构建“轻负高效”的教育学理论提供了鲜活样本。同样，乡村教育振兴研究中，“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中国命题，通过“乡村振兴重点县教育质量提升计划”的实践，正逐步形成有别于西方“教育公平”理论的本土解释框架。

（二）推动英才教育范式转型

传统英才教育的“选拔导向”模式，在实践中逐渐显露出结构性弊端：过度聚焦“筛选机制”导致教育资源向少数群体倾斜，不仅加剧了教育焦虑，更因“唯分数论”的评价逻辑，窄化了英才培养的多元维度。例如某些地区的“尖子班”为维持升学率，长期压缩音体美课程，导致学生出现“高分低能”的发展失衡——这种以“淘汰多数”为代价的培养模式，与《纲要》提出的“面向全体、因材施教”理念形成鲜明反差。

《纲要》倡导的“培养导向”范式，通过双重革新重构英才教育生态。在课程改革层面，模块化“天才课程”打破了传统班级和年级的边界，构建起“基础层+拓展层+创新层”的三级课程体系。某中学的实践颇具代表性：为数学潜能突出的学生开设“拓扑几何与密码学”课程，与高校数学系联合设计项目式学习模块；对艺术天赋显著的学生，则打通与本地美术馆的合作通道，通过“策展实践”课程培养综合素养。这种“按需选课、跨级流动”的模式，让每个学生都能在适合自己的轨道上发展。

师资建设的“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行动”，则从供给端破解英才培养的师资瓶颈。该行动通过“双导师制”实现资源贯通：高校教育学院教授负责理论引领，定期开展“英才教育方法论”；中小学骨干教师承担实践指导，在日常教学中落实培养理念。某师范大学与附属中学的合作案例显示，经过系统培训的教师，在“跨学科课题指导”“个性化成长档案构建”等能力上的提升率达82%，有效支撑了英才培养模式的落地。

（三）深化教育综合改革

教育综合改革的深化需要“评价革新”与“治理升级”的双向发力，形成系统推进的改革合力。

在评价改革维度，中考“全科开考+综合素质评价”的实施，正逐步打破“唯分数”的单一导向。“全科开考”并非简单增加考试科目，而是通过“学考+选考”的组合设计，引导学生全面发展——某省将历史、地理等学科纳入计分体系后，初中阶段人文社科类选修课的选课率提升40%，有效纠正了“重理轻文”的倾向。综合素质评价则通过“过程性记录+多元举证”的方式，将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科技创新等纳入评价维度，某试点地区的案例显示，85%的高中校长认为，这一改革让“有特长、敢创新”的学生获得了更多发展机会。

高考对“关键能力”的考查强化，更凸显了从“知识立意”到“素养导向”的转变。近年来高考命题通过“真实情境+问题解决”的设计，如将“碳中和”目标融入化学试题、用“乡村振兴案例”考查经济学思维，倒逼基础教育阶段重视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某重点高中的备考实践表明，转向“情境化教学”后，学生在“信息提取”“逻辑推理”等核心能力上的表现显著提升。

治理创新层面，“教育大数据中心”的建立为精准决策提供了技术支撑。该中心通过整合学籍管理、教学质量、资源配置等多维数据，构建起“动态监测—预警干预—优化调整”的治理闭环。在教师编制调整中，AI算法不仅分析在校学生数量，更结合人口流动趋势、城镇化速率等变量，对城乡师资需求进行预测——某县通过该系统，将23名超编城区教师调配至新建社区学校，同时为偏远乡村学校增加15个机动编制，实现了人岗匹配的动态平衡。这种数据驱动的治理模式，正推动教育资源配置从“经验决策”向“科学精准”转型。

报告嘉宾：朱德全 西南大学教育学部部长、教授

报告题目：《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中国道路”：“三教三融”协同逻辑》

尊敬的各位同仁：

大家好！

在当前我国教育体系中，职业教育的地位愈发关键。从党的十八大强调“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到十九大提出“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再到二十大指出“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这一系列政策表述的演进，清晰展现出党对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规律性认识的逐步深入。在此大背景下，深入探究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意义重大，而“三教三融”便是其中的核心要点。

一、“三教”协同创新的内涵与意义

（一）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的内在关联

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交织、彼此影响。职业教育侧重于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使其能迅速适应社会岗位需求；高等教育注重学术研究与知识创新，为社会提供高端专业人才；继续教育则为不同年龄段、不同职业背景的人群提供持续学习与提升的机会。在现代社会，个体的职业发展往往不是单一阶段、单一模式的，而是需要在不同阶段借助不同类型教育实现持续成长。例如，一个高职毕业生在工作数年后，可能通过继续教育提升学历，进而有机会接受更高层次的高等教育，拓宽职业发展路径；而高等院校的毕业生，也可能需要通过职业教育获取特定职业技能，以更好地适应职场变化。



（二）“三教”协同对人才培养的整体效应

统筹“三教”协同创新，是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的必然要求。在当下，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民众对教育公平的需求发生深刻转变，从单纯追求教育机会的数量，转向对教育质量、个性化发展以及终身学习的强烈渴望。职业教育作为教育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应充分发挥其灵活性与开放性，搭建起与普通教育、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职前教育与职后教育相互沟通衔接的桥梁。以一些发达国家为例，它们构建了完善的“立交桥”式教育体系，学生可以在不同教育类型和阶段之间自由转换，实现多路径融通、多通道成才。我国也在积极推进相关改革，如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健全职业教育招生考试制度等，但距离“三教”深度协同创新的目标仍有差距，需进一步突破思想观念、体制机制等方面的障碍。

二、“三融”系统改革的要点剖析

（一）职普融通——多样化教育选择的基石

中职教育多样化发展：各地应依据区域社会发展程度、产业需求以及职业教育发展基础，推动中职教育朝着多样化方向前行。不同地区产业结构各异，对人才的需求也不尽相同。在一些制造业发达地区，中职教育可侧重于机械制造、电子信息等专业；而在旅游资源丰富的地区，旅游服务、酒店管理等专业则应成为重点发展方向。通过多样化发展，中职教育能够更好地满足当地产业对不同层次、不同类型技能人才的需求。

学生成长成才通道的建立：要在义务教育后的不同阶段以及不同教育类型之间，精心设计转换通道和融通机制。例如，可通过建立学分互认制度，让普通高中学生有机会学习职业教育课程并获得相应学分，在未来升学或就业时，这些学分能够得到认可；职业院校学生也可通过特定途径，参与普通高中的文化课程学习，提升自身综合素质，为进一步深造打下基础。目前，部分地区已开展试点，允许职业院校学生参加普通高考，同时也鼓励普通高中学生选修职业技能课程，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二）产教融合——教育与产业共生共长的纽带

省域、市域及行业层面的改革举措：以探索省域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新模式为核心，以建设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跨区域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为支撑，深化职业教育改革。在省域层面，政府应统筹规划，根据本省产业布局，引导职业院校合理设置专业，避免专业同质化竞争。例如，某省汽车产业发达，该省可集中资源，在多所职业院校打造汽车相关专业集群，形成从汽车制造、维修到销售的全产业链人才培养体系。在市域层面，产教联合体可由地方政府牵头，联合当地企业、职业院校和科研机构，共同开展人才培养、技术研发等工作。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则聚焦于特定行业，整合跨区域的行业资源，推动行业整体发展。

企业主体作用的发挥：产教融合的关键在于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引导企业深度参与职业院校人才培养。企业应与职业院校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将企业的实际生产需求、工艺流程融入教学内容。例如，企业可以为职业院校提供实习实训设备，派遣技术骨干担任兼职教师，指导学生实践操作；职业院校则根据企业需求，调整课程设置和教学计划，培养符合企业要求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同时，企业还可与职业院校共建产业学院、实训基地等，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真正做到以产定教、以教促产。

（三）科教融汇——服务创新驱动战略的新引擎

职业教育在科技创新中的角色：职业教育身处生产第一线，在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肩负着重要使命。一方面，要为破解“卡脖子”问题培养大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这些人才不仅具备扎实的专业技能，还拥有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能够在实际工作中解决技术难题。另一方面，职业教育要成为科技成果转化的“中试车间”，将科研机构的创新成果进行二次开发和应用转化，使其能够真正落地生产，为产业升级提供支撑。例如，一些职业院校与科研机构合作，建立了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将先进的科研成果引入学校，通过实训教学和技术服务，帮助企业实现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

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精准对接：职业教育应紧密围绕产业链需求，开展科研创新活动，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的精准对接。职业院校要加强与企业的产学研合作，了解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面临的技术瓶颈和创新需求，针对性地开展科研项目。同时，

职业院校还应积极参与行业标准的制定和修订，将自身的科研成果和实践经验转化为行业规范，推动整个行业的技术进步和创新发展。此外，职业院校还可通过举办创新创业大赛、技术技能竞赛等活动，激发学生的创新热情，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为社会输送更多具有创新精神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三、“三教三融”协同逻辑的实践路径与案例分析

（一）政策引导与制度保障

国家层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如《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等，为“三教三融”提供了政策支持和方向指引。地方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应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和配套政策，建立健全相关制度，保障“三教三融”的顺利推进。例如，设立专项经费，用于支持职业院校与企业、科研机构的合作项目；建立考核评价机制，对在“三教三融”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表彰奖励；完善法律法规，明确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权利和义务，为产教融合提供法律保障。

（二）典型案例分析

某省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实践：该省成立了多个职业教育集团，由行业龙头企业、骨干职业院校、科研机构等共同组成。集团内各成员单位通过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实现了产教深度融合。在人才培养方面，企业参与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提供实习实训岗位，职业院校为企业输送了大量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在科研创新方面，集团内的科研机构与职业院校、企业合作，开展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解决了企业的技术难题，推动了产业升级。例如，某汽车职业教育集团，通过整合汽车制造企业、职业院校和科研机构的资源，共同开展新能源汽车技术研发和人才培养，为当地汽车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某职业院校与企业共建产业学院案例：某职业院校与一家知名企业共建了产业学院，双方共同投入资金、设备和师资，开展人才培养和技术服务。产业学院根据企业需求设置专业课程，采用“现代学徒制”等人才培养模式，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就能接触到企业的实际生产流程和技术标准。企业为学生提供实习和就

业机会，学生毕业后能够迅速适应企业工作岗位。同时，产业学院还承担了企业员工的培训任务，为企业的技术升级和员工素质提升提供了支持。该产业学院成立以来，已为企业培养了数百名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得到了企业和社会的高度认可。

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中国道路”，核心在于“三教三融”的协同推进。通过“三教”协同创新，能够充分发挥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的整体优势，满足社会多样化的人才需求；借助“三融”系统改革，能够实现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推动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在实践过程中，要以政策为引导，以制度为保障，积极探索创新，不断总结经验。未来，随着“三教三融”的深入实施，我国职业教育必将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更加有力的人才支撑和技能保障，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之路。

报告嘉宾：顾建军 南京师范大学劳动教育研究院院长、教授

报告题目：《工程技术人才培养体系建设与教育高质量发展》

尊敬的各位同仁：

大家好！

《工程技术人才培养体系建设与教育高质量发展》——关于这个主题，通过调研发现了什么呢？就是说在教授技术时，还需要关注经济层面的人效问题。这里需



要注意的是，我们在提出建议时，会涉及父母的认知、对模糊性的理解、父母的思维方式以及沟通等方面。而我想重点讲的是，当代技术的影响其实是无处不在的。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不理解当代的基本工程技术，就无法理解当代社会的根本，也难以真正读懂当代社会。从技术工程的发展来看，刚才也提到过，早期可能更侧重培训与计算，但到了 2.0 阶段之后，就更注重技术方法了。此外，启蒙主义也强调知识的重要性。所以，技术与工程的认识论和价值论是值得关注的——这一点想和大家分享，不知道我们是否能看到孩子们对这些的兴趣呢？

到了初中、高中阶段，还有不少学生对技术相关内容存在畏惧，这会影响他们后来接触计算机工程等领域。不过 2012 年之后，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

马斯克大家都知道，他在早期探索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他的兴趣爱好正是在小学阶段的好奇心驱使下形成的，之后才逐渐涉及系统研究、正式探索等。马克思在 19 世纪特别谈到教育与工程技术，提到了几个基本标准，尤其强调重工业标准。爱迪生也是如此，小学阶段就对动手实践充满好奇，开始接触工具，甚至有了自己的小探索。

以上是我们做的一些调查。

技术与工程这两个话题是有区别的。技术涉及专案设计、绘制工具使用，以及工具、材料的供需规则与方法等，其关键在于迭代复盘、全员参与复盘机制。

而工程相对复杂，涉及性能、质量、相关政治因素等，关键在于贯彻制造与维护方法、教学法、法律法规，还包括人文素养、实践空间管理等。其中的系统分析法、层次分析法、关键路径法、成本故障法等，我们很多时候都在借鉴使用。

最后简要提一下相关内容。海德格尔将这一技术工程事件与前一阶段的发展相联系，布库尔也提出过三级分类。随着人类认知的发展，从对自然的认知到对人文的认知，人类世界的创造离不开技术与工程的突破。这些理念可以通过从技术教育到职业教育再到高等教育的环节传递。此外，日本有相关实践，比如中小学设有专门的技术教育库和渠道。

我们现在提到技术教育，可能误以为它等同于职业教育，其实不然——普通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中都包含技术教育，都渗透着技术的思想方法。欧盟在南斯拉夫也有类似实践，而我们的儿童技术教育，从模式来看主要偏向技术层面，就像用 200 元通过微信进行实践操作那样。

数据显示，全国高等教育公布的教辅人员有 52 万，占教师总数的 30%，他们需要接受技术工程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培训；中等职业学校中有 20 多万人需要接受基本的技术工程教育；中小学生中约 6 万人需要强化相关教育。做好这些，技术人才培养体系才能真正完善和进步。高等教育要支撑基础教育，基础教育也要打好扎实的基础。

教育与人才培养是一体的，在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强大的支撑作用。谢谢。

报告嘉宾：徐晓东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学院认知与技术学院认知与技术研究室主任、教授

报告题目：《以教育强国建设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



尊敬的各位专家、各位同学：

上午好！早上听了几位专家的报告，非常受启发。尤其是周老师上午对《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做了很细致的解读。考虑到时间关系，刚才主持人说要在十五分钟内结束，现在还剩十分钟，我们就直接进入内容。

今天主要想从另一个角度，谈谈《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中，人民群众对教育发展提出的多样化、个性化和活力化需求，以及国家和教育主管部门为满足这些需求所提供的多样化选择。那么，如何在实践中落实这些政策？如何在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中践行这一策略？我想结合个人体会谈谈，目前主要有两个视角，其中一个是个性化——这个观点其实有很长的历史。我从事教育技术学的教学与研究，在技术层面为实现个性化教学付出过努力，也做过一些实践和研发。

一、个性化教育的技术探索：从历史镜鉴到当代实践

教育个性化的追求并非新命题，其发展始终与技术革新深度交织。

（一）技术支撑的个性化雏形

上世纪 50 年代，我们教育技术学的学科创始人、著名行为主义心理学家斯金纳，1954 年去听他女儿的课时，发现老师的教学内容和他研究的学习理论完全背道而驰，于是他回来发明了教学机器。从 1956 年开始，个性化教学就变成了以技术为支撑的个人化教育过程——这一理念与当前纲要中“发展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形成跨越时空的呼应。

（二）信息技术革命的迭代推动

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计算机科学家培尔开发了 LOGO 语言。他在 70 年代和 80 年代，曾在 OECD 教育部长会议（这类会议大概每四年开一次，70 年代有两次）上提到：如果给每个学生配备一台电脑，或许能改变当前落后的教育状态，甚至可能替代教师。后来到了第二轮人工智能兴起时，美国西北大学的著名人工智能教授也重新提出，要利用技术实现个别化教育，他和斯金纳、培尔的思想一致——都是想借助高度发达的信息技术。

当年的个人计算机，70 年代时还像这间会议室这么大，非常复杂，后来逐渐变小，变成了小巧的电脑。从 1984 年我在东北师大物理系留校后就有体会。当时系主任跟我说，物理系要和数学系共建一个专业，还没想好名字。东北的老师爱开玩笑，说起来像打电话找不着号码似的，挺有意思。1984 年我们招了第一批学生，

1985 年还没上课时就开始做计算机辅助教育、计算机辅助教学。在 PSI (个性化教学系统) 之前 , 有个性化数据系统 , 之后出现了计算机辅助教学 ; 后来我去日本留学 , 又接触到计算机辅助学习 , 我的硕士论文就做了相关研究。进入博士阶段后 , 恰逢第二轮人工智能兴起 , 又出现了适应性学习系统 ;2010 年深度学习在计算机领域取得突破后 , 智能辅导系统等也随之发展。

这 42 年的实践证明 , 技术从未取代教师 , 只是一代又一代的新信息技术取代了传统技术 —— 这为纲要中 “ 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 ” 提供了历史注脚。

二、教育多样性的国际镜鉴 : 需求响应与实践创新

满足人民多样化需求 , 需在比较视野中探寻适合中国的路径。

(一) 日本 : 均衡基础上的生活化实践

日本是我们的邻居 , 虽然有过历史恩怨 , 但作为邻居 , 和我们有很多相同之处 , 也有差异。比如我们都强调教育公平和均衡发展 , 日本有学校教育积分制 , 我们有《义务教育法》 , 2018 年人大还修订了相关规定 , 禁止分重点班、重点校。而日本为了极致地实现教育公平和均衡 , 实行教师轮岗制度 : 校长每 6-7 年要调到其他学校 , 教师每 5-6 年轮岗一次。因为日本的中小学教师属于公务员 (文部教官) , 要为全体国民服务 , 需要到不发达地区任教。

日本的高中和我们的高中差别不大 , 世界上除了北欧和西欧的德国 , 其他国家的高中和我们差异都不算大 , 大多以升学为主要目标。但日本的中小学有个特点 : 课程不多 , 但特别重视 “ 学会生活 ” —— 培养解决生活问题的能力、良好的生活习惯和社会规则。比如小学一年级就开始上 “ 生活科 ” “ 家庭科 ” , 和美国的 social studies (社会科) 类似。三年级的社会课会让学生做街头采访、调查物价 ; 生活科和家庭科则教生活技能 , 比如系鞋带、清洗厕所。我儿子在日本上小学时 , 这些都学过 , 现在他 30 多岁了 , 系鞋带还是当年学校教的方法。我在大学时 , 寝室的厕所都是我清洗的 , 同学还以为是保洁阿姨做的 —— 其实这些生活技能很重要 , 希望中小学老师能重视这类教育。

日本的小学和初中，把“健康的体魄”放在教育目标的第一位。其小学和初中，学科类课程只占 40%，非学科类占 60%，内容丰富且注重实践（如四年级学生在学校住一周，五年级去海边住一周）。同时，日本的中小学没有班长，所有活动都靠值日生负责，这对培养责任感很有帮助——这些实践为我国“双减”政策落地和“健全全面发展教育体系”提供了重要参考。

（二）美国：分层分类的个性化探索

美国和中日的学制不同，通过另一种方式实现教育多样性。美国相信“天才”的存在，英才教育的第一步是选拔，之后送入私立学校；即使公立学校，也分快慢班，和我小时候的情况类似。同时，为了促进个性化发展，还有很多特色学校——喜欢戏剧的去戏剧学校，喜欢音乐的去音乐学校；公立学校也有专门的教师负责人才选拔。这种“选拔 - 培育”双轨制，与我国“职业教育多样化发展”形成互补，为处理“规范引导与激发活力”的关系提供了实践样本。

三、中国路径：从工具现代化到观念革新

纲要落地的核心挑战在于“人的现代化”。当前存在三重错位：

技术超前与观念滞后：我国教育技术硬件已达世界前列，但去中小学听课会发现，过去老师一边板书一边讲，学生有时间跟着思考；现在都用 PPT，一页接一页翻得很快，还没消化就进入下一页。有时老师说“下面讨论 3 分钟”，但学生还在看题、没理解题目，3 分钟就到了，只能匆匆分类总结——这些问题暴露教学理念未跟上工具革新。

内容丰富与实践不足：课程标准强调“核心素养”，但中小学仍存在“重知识灌输、轻生活能力”倾向。第五轮课程改革增加了综合实践活动，培养了语数科技的王星星、杨万峰、李欣等一批年轻企业家，证明实践导向的重要性，需进一步借鉴日本“学会生活”的培养逻辑。

政策供给与落实温差：纲要提出“多样化选择”，但家长“唯分数论”、学校“标准化培养”的惯性仍在。我们常说“不要输在起跑线”，但其实问题不在起跑线，

而在教育方式。心理学家和人类发展学家说，孩子需要玩耍，否则会影响成长——这需要以思想解放破解。

欧洲文艺复兴就是通过思想解放，为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奠定了基础，还推动了工业革命。对于我们的教育现代化，我认为应该先实现人的思想观念现代化，再是学校和教育制度的现代化，最后才是手段工具的现代化。但现在恰好相反，我们的手段工具现代化可能在世界上做得不错，思想观念却还没跟上。就像叶澜教授说的，教育现代化最终应该是人的现代化。

谢谢大家！

报告嘉宾：李 莉 海亮教育科技
服务集团党委书记

报告题目：《县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海亮实践与思考》



尊敬的各位专家、同仁：

大家好！今天很荣幸分享海亮教育在县域教育高质量发展领域的探索实践。作为一家深耕教育 30 年的企业，我们始终坚信：教育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石，而县域教育则是其中的关键支点。

一、海亮教育的定位与使命

海亮集团创立于 1989 年，36 年来坚守“既讲企业效益，更求社会公德”的理念，连续 5 年跻身世界 500 强（2024 年排名第 429 位）。作为集团核心板块，

海亮教育自 1995 年创立以来，始终以“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初心，当前更将乡村教育振兴列为永久头等大事，聚焦“构建教育生态圈、建设卓越教育高地”三大战略，致力于以科技和服务推动大规模、高质量的因材施教。

截至目前，海亮教育已在全国 22 个省派驻核心服务团队，为 150 余所学校提供综合管理服务，覆盖学生超 25 万人，自有及服务学校达 220 多所，惠及 30 万师生。所有合作均坚持“四不变”原则——学校公办属性、教师编制、资产权属不变，保质保量完成教育任务，这是我们扎根县域的基本准则。

二、县域教育振兴的四大实践路径

在服务县域教育的过程中，我们探索形成了“管理新教、人才新教、科技新教、协同新教”四位一体的实践框架：

（一）管理机制创新：筑牢发展基石

机制创新是县域教育提质的前提。我们将企业管理智慧融入教育场景，聚焦三大核心：

目标管理：与合作学校共同制定量化指标体系，让发展方向清晰可及。例如在广西天等县高中，我们根据学情定制“三年升学阶梯目标”，每学期分解为可执行的教学任务；

绩效考核：将学生成长数据、教学创新成果纳入评价，以资金增量打破“平均主义”。某县域初中实施后，骨干教师月绩效差距拉大至 3 倍，课堂创新案例增长 40%；

流程优化：精简行政事务，让教师将 70% 以上时间投入教学核心工作。

具体模式上，我们向薄弱学校派驻 3 人管理团队（校长、副校长、校长助理）全面接管运营，通过“半年诊断、一年见效”的节奏推动蜕变。目前已收到 80 余封县级政府感谢信，印证了管理模式的适配性。

（二）人才生态构建：双轮驱动破局

“让最优秀的人培养更优秀的人”是我们的人才理念。通过“外部导入 + 本土激活”破解县域人才困局：

高端人才下沉：130名清华北大毕业生、1600余名双一流学子组成青年骨干团队，以校长助理等身份扎根县域。北大化学系毕业生乔雪林任职西北某校三年，带领学校重本录取人数创十年新高；

本土人才培育：“优计划”遴选县域优秀学子，提供求学资助与定制培养，目前已有200余名学子签约回乡任教；

体系化赋能：通过干部铁军学校（林峰班、云峰班等）培养管理人才，五年来输出校级干部300余名；500名正高级教师组成“流动专家库”，以临时工作室形式驻校指导。

（三）科技赋能教育：打破资源壁垒

2021年成立的海亮科技集团，已研发200余款教育科技产品，核心是实现“优质资源规模化下沉”：

AI+课堂重构：在自营校试点“教师 + AI”模式，AI精准分析学情，教师聚焦人文引导，使西部某县域中学本科上线率从13%提升至27%；

资源固化沉淀：将东部名校课程理念转化为标准化课件库，通过“高效课堂”系统覆盖150所合作校，使山区孩子同步享有前沿教学资源。

去年在广西忻城县中学的实践尤为深刻：协议约定400名考生中52人达本科线即完成任务，而通过科技赋能与教学改革，实际达标109人。但当地宿舍、教室等硬件差距仍触目惊心，更让我们深感教育公平的责任之重。

（四）协同共治生态：凝聚多方合力

乡村教育振兴需要全社会参与。我们构建“基金会 + 企业 + 政府 + N”模式：

生态圈建设：联合洋葱学园、天籁教育等机构，通过规模化采购降低资源下沉成本，已链接优质课程资源超5000课时；

公益创新：县域教育振兴基金会采用“透明化捐赠 + 定制化服务”模式，发动 30 所自有校家长参与助学，去年投入公益资金超 2000 万元。

三、实践成效与未来展望

三年来，我们见证了县域教育的显著变化：

广西天等县高中打破十年清北录取僵局，特控线人数增长 60%；

海南屯昌中学 600 分以上人数增幅 138%，实现“低进高出”突破；

重庆巫山合作校教师教研成果获市级奖项数量翻倍。

这些数据背后，是一个个乡村孩子命运的改变。正如广西忻城县教育局在感谢信中所言：“与海亮合作，让我们看到县域教育迈向高峰的无限可能。”

未来，海亮教育将继续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信念，在 22 个省的 150 余所学校深耕细作。我们坚信，只要坚持“国家所需、群众所盼、海亮所能”，就一定能让每个县域孩子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为教育强国建设注入基层动能。

谢谢大家！

报告嘉宾：付卫东 华中师范大学
人工智能教育学信息化与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教授

报告题目：《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与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尊敬的各位老师、同学们：

下午好！我是华中师范大学人工智能教育学信息化与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的付卫东。今天，我汇报的主题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与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主要围绕五个核心方面展开：一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定义，二是其基本特征，三是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表现，四是应用过程中面临的主要挑战，五是推进其规范应用的路径选择。

首先，我们明确什么是生成式人工智能。

生成式人工智能是一种通过学习大量训练数据及数据分布规律，生成与训练数据相似但不完全相同的新内容——涵盖文本、图像、音频等多种形式的人工智能技术。这一核心定义，是我们理解其应用价值的基础。

接下来，梳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六大基本特征。

第一，生成性。与传统人工智能模型不同，它能够创造全新的、与训练数据相似的内容，应用场景覆盖多个领域。第二，偏差性。生成内容具备灵活性与多样性，比如对话系统可根据用户需求生成差异化问答，进而提升推荐的准确性与丰富度。第三，多模态性。能够生成文本、图像、视频、代码、音频等多种类型内容，在教育领域展现出巨大应用潜力。第四，一致性。具备形式化能力，为模型业务的多样化提供可能；结合精心设计的机制，可显著提升应用表现，例如有效避免生

成涉及个人隐私的内容。第五，交互性。支持人机交互，能快速理解用户需求并做出正向反应，还可根据用户的风格偏好、修改建议等反馈调整输出，持续优化性能与效率。第六，优先级局限。逻辑输入可能偏离用户实际需求，在部分场景中模型表现不稳定，存在一定的应用局限性。

了解了基本定义与特征后，我们重点探讨生成式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表现，主要体现在四个维度。

其一，优化教育资源配置。一方面，它能快速生成文本、图片、音频、视频等多种形式的高质量素材，丰富教师的教研素材库与学生的学习材料；另一方面，可打破区域与学校的壁垒，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尤其能助力农村等教育薄弱地区通过这一技术获取优质资源，有效提升当地教育质量。其二，提高教育效率和质量。在个性化学习方面，能根据学生的学习进度、知识掌握程度及学习风格，精准规划个性化学习资源与路径；在教学支撑方面，可帮助中小学教师快速生成教案、教学答案、课件等教学材料，优化教学内容组织方式，提升教师教学能力；在学习辅导方面，学生可通过智能学伴获取准确、详细的问题解释，及时解决学习困惑。其三，促进学生能力发展。通过故事、游戏、动画等生动形式，激发学生学习动力，培养高阶思维与学习兴趣；同时，学生在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交互过程中，能够锻炼信息获取、筛选与评估能力，显著提升信息素养。其四，推动教育评价改革。借助技术优势收集学生学习过程中的各类数据，如学习行为、探索过程等，基于这些数据开展多维度评价并给出针对性反馈，帮助教师及时发现学生学习中的问题，实施精准指导。

在看到积极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正视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基础教育应用中面临的主要挑战。

挑战一，教育不公平加剧风险。由于技术设备、网络条件等存在差异，生成式人工智能无法被所有学校和学生公平获取，经济落后地区或困难家庭的学生难以充分利用这一技术，可能进一步扩大教育差距。挑战二，技术依赖风险。中小学生若过度依赖生成式人工智能提供的答案和解决方案，可能逐渐削弱自主学习能力与问题解决能力，不利于核心素养的培养。挑战三，偏见与伦理问题。部分

模型可能嵌入性别歧视等隐藏代码，生成的内容存在隐蔽的歧视倾向或刻板印象，容易引发算法偏见与伦理争议。挑战四，数据安全与隐私泄露隐患。师生的姓名、身份证号、家庭住址等敏感信息若在应用过程中泄露，可能导致人肉搜索、恶意攻击、勒索等安全问题。

针对上述挑战，结合国家近期相关政策——如2024年《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指南》、2025年4月《推进教育数字化的意见》及《中小学生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使用指南》等，我提出以下四方面路径选择建议。

第一，在管理政策层面。要依据相关指南明确规范，确保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校园内的安全使用；实施数据分类管理，对师生敏感信息采用加密保护，提升安全防护等级；建立白名单制度，限制数据共享范围，仅允许经严格审核、数据安全有保障的工具进入校园。第二，在教育培训层面。加强对师生的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意识培训；强化教师的引导与监督职责，确保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过程透明可追溯；借助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等优质资源，加强人工智能通识教育，提升师生信息素养，帮助师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强化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理解、风险认知与实践技能。第三，在资源配置层面。坚守教育公益属性，抵制功利主义倾向，加大对数字教育资源的投入力度，重点关注农村地区、困难家庭等边缘群体，缩小技术应用差距，解决技术红利分配不均的问题。第四，在环境与政策层面。完善宏观政策体系，明确中小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范围、步骤、注意事项及保障措施；结合不同地区的教育发展实际，弹性调整政策细则，保证制度的合理性与科学性，推动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基础教育领域规范、有序应用。

以上就是我今天汇报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聆听！

报告嘉宾：毛红芳 咸阳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教授

报告题目：《“教学论”学在中国的意义流变与学科话语体系发展历程》



尊敬的各位同仁：

感谢母校邀请，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教学论”这一概念的问题。对教学论的关注源于我们原本对教学的关注，在教育强国这一背景下，关注教育就必须关注教学，而对教学本身的理解以及对其意义内涵的深刻把握，是我们把握教学论这一学科的基础。

所以我的分享会基于历史性梳理，进而展望教学论作为学科话语体系的发展历程与未来走向。我主要从三个部分展开：首先从资源角度看教学论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话语演变。教学论作为学科的核心概念术语，也是学科话语体系的基本元素，其发展演变伴随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个进程。

首先是20世纪初，也就是1901年，第一个教育期刊诞生后，我们开始从国外借鉴相关理论，从借鉴日本转向借鉴德国的教学论。当时借鉴的概念术语是“教授学”，这三个字是日文的表达，源于汉字转借。那时对教学论的表达就是“教授学”和“教授法”，从当时国内一些教材（比如部分主编的教材）的名称中，能看到对教学的表述用的就是“教授学”或“教授法”。

到了20世纪20年代左右，特别是欧美的教育思想进入后，陶行知回国后主张不能只看教法，更应关注学法，所以在概念上开始提倡将“教授法”改为“教学法”，以凸显学生在教学中的核心地位，这一变化也体现在当时的教材或著作名称中。

这是第一个阶段，词源经历了从“教授学”“教授法”到“教学法”的演变，这是教学论早期的表述。从《大教学论》等著作的书名中，也能看到这种词源变化对著作名称的影响，比如有“大教学”“大教学论”“大教学法”等表达。

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之后，我们开始借鉴苏联的教学论及话语体系，关注“教什么”的基本原理和学问，学科名称也开始表达为“教学论”。1961年，我们翻译了苏联学者达尼洛夫和耶斯波夫的教学论著作，这被认为是第一本以“教学论”命名的著作，当时教学论学科体系的典型特征是苏氏风格。后来，特别是七八十年代，在吸收借鉴英美式教学理论后，我们的表达转化为“教学理论”。

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英美的语境中，教学理论不是独立学科，而是独立研究领域，其学科身份在英美并不存在，只是对应研究领域。但我们将其作为学科对等表达，就因这种误解产生了话语语境上的差别。因为在英美的教学理论中，作为独立研究领域，其角色非常明确，是实用主义性质的理论，目的是促进学生学习，它是研究理论而非学科。所以从资源演变过程来看，我们的术语表达经历了“教授学”“教授法”“教学法”“教学论”“教学理论”，也先后经历了不同国家语境的变化。当然，这些语境在现在依然存在，尤其是从七八十年代到现在，我们在借鉴过程中因语境不同导致话语体系存在差异，进而出现概念不一致的情况，这就产生了概念本身的困境和核心意义的流变。主要表现在：

一是术语解释偏差带来的困惑，这源于我们在借鉴过程中，学科表达、学科身份及研究领域等的指向和释义不同，且本土化处理存在问题。比如早期从日本借鉴再转向德国教学论时，“deductive”这个词与现在英语表达对等时存在窄化；又如英美的教学理论并非学科，我们却按学科对等，导致指向不对等；再如德国的教学论与英美语境中的相关概念不存在完全对等，当它从学科到教学理论进入我国后，就形成了话语和语境之间的差异。

二是核心概念的意义流变，表现为“教化”这一概念的演变。我们知道教学论源于德国，德国有一个极具隐喻意义的词“build down”，其翻译存在争议，有“教养”“教化”等表达，这些表达背后的隐喻源于德国哲学语境和文化传统，它所要表达的重点是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让学生与世界连接，达到人的完整性，教育只

是过程和手段而非最终目的，就像我们常说的“教学具有教育性”，这里的教育最终要达到教化的目的。但这个词在传入日本、德国，再到苏联的过程中，其核心意义难以把握，经历诸多争论后意义逐渐流失。我们在借鉴多国理论后，对教学论核心意义的把握也陷入困境，将其转化为关于教学的内容时，突出了方法性和技术性，却忽略了人文性宗旨。

三是泛话语范式的语境差异，不同语境中学科的立场、发展定位、研究领域、方法论等存在差异，导致我们在借鉴中式、德式、英美式理论并进行本土化处理时，出现话语交际后概念范畴模糊或不清晰的状态，使我们的话语体系看似成了“大杂烩”，因此构建本土话语体系的迫切性就显现出来。

立足现在文化自信的角度，我们要建立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话语体系、学科话语体系等，如何发展教学论的本土特色学科话语体系就显得非常迫切和必要。话语作为学科思想的表达工具，我们要关注其发展历程中的规律和趋势。其实从我国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就有学者探索学科话语历程及基于本土特色的话语发展，总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主要是实现教学论中国化，走向中国的教学论，不再单纯借鉴国外或照搬。这一时期，研究者和学者们进行了诸多探索，出版了适合中国的教学论著作引领学科发展，教学论的学科身份也得到确认，80 年代的一些标志性事件正式确立了其学科身份。这一阶段还出现了以王策三教授为代表的“特殊认识论”，形成了完整的泛生体系建构，北师大等知名学者也不断探索。正如郭华教授所说，教学论、教学认识论的确立，标志着中国教学论正式独立自主地向探索教学规律的科学化道路前进，正式亮出了我们自己的教学论身份。

第二个阶段是基于范畴关系的教学论话语体系成熟。80 年代确立学科身份后，这一阶段通过对范畴和关系的争论，进一步澄清教学论的学科属性。以西北师大李玲和教授为代表的“七要素论”，为教学论学科话语范畴奠定了重要基础，现在很多教学论著作的目录都能体现这种要素导向。

第三个阶段是扎根本土实践，出现了基于生命自觉、生命实践的教学论反思。

2000 年之后，特别是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以来，从实验到进入学校，大家逐渐形成自觉意识，教学论的学术研究和实践研究成果蓬勃发展、空前繁荣，凸显时代特色的教学研究增多，扎根本土的教学流派也越来越多。我们有了基于中国特色的教学流派来解释中国教学实践，并指导实践，形成了自己的模式。这一时期，生命实践学派走向成熟，以华东师大叶澜教授团队为引领的新基础教育研究形成了中国式原创学派，这是第一个以学派亮明身份的团队。生命实践学派不断发布研究成果、指导实践，生命力日益强大，“教天地人事，育生命自觉”是该学派对中国教育的最好诠释，其创建和发展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中国教学论学术话语体系以及中国教学理论对中国实践的阐释和指导力量。

总体来说，建构中国教学论学科体系，形成话语表达方式，必须寻找根基、扎根本土，逐步推动话语体系完善成熟，这需要所有研究者共同努力。以上就是我的汇报，谢谢大家。

发言嘉宾：李晓华 青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教授

发言题目：《教育家精神赋能民族地区教师专业发展的价值逻辑与实践路径》

尊敬的各位同仁：

今天，我想围绕“教育家精神能否赋能民族地区教育发展”这一核心命题展开探讨。2023 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教育家精神的丰富内涵，为教师队伍建设指明了方向；2024 年中央文件进一步强调“强化教育的经济能力”，凸显了教



师专业发展在教育强国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对于自然条件艰巨、文化构成复杂的西部民族地区而言，以教育家精神引领教师成长，既是提升教学质量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关键路径。

一、西部民族地区教师专业发展的现实困境

民族地区教师的专业素养直接关系教育质量，但当前在理念、知识、能力、情怀四个维度仍存在突出短板：

（一）教育理念滞后于时代需求

部分学校仍延续“工厂式”教学模式，将知识技能达标作为核心目标，忽视“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尽管国家持续推进教师培训，但“终身学习”“深度教学”等理念在落地中存在温差——不少教师对前沿教育思想一知半解，更难以转化为教学实践。

（二）知识结构存在明显断层

教师应具备的分析性知识、教育知识、通识性知识体系尚未健全：本体性知识薄弱，部分高中物理教师完成高考模拟卷仅得二三十分；数字化知识欠缺，难以适应教育数字化转型要求；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系统认知不足，影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实效。

（三）教育能力面临高阶挑战

教师虽具备课堂组织等基础能力，但关键能力存在显著差距：数字技术应用能力不足，即便在对口帮扶下配备了先进设备，多数教师仍无法熟练操作；课程开发、教学反思、教育研究等高阶能力欠缺，难以应对素质教育需求。

（四）教育情怀遭遇现实冲击

民族地区教师普遍怀有教育热情，但长期面临“生存型困境”；寄宿制学校占比高，教师在编制不增的情况下，既要承担教学任务，又要负责学生生活管理，日均工作时长远超8小时；

职业的“动作感”“实践感”过重，导致教育理想在现实压力下逐渐消磨，难以坚守长期主义的教育追求。

二、教育家精神与教师专业发展的契合逻辑

教育家精神为破解上述困境提供了价值坐标，其内涵与教师专业发展需求存在深度耦合：

（一）政治属性：筑牢精神根基

“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言为世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回应了“为谁培养人”的根本问题。这要求民族地区教师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将个人成长融入国家战略，在多元文化环境中坚守育人初心——这种精神支撑恰是当前教师群体亟需补足的“精神钙质”。

（二）社会属性：强化能力支撑

“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聚焦“如何培养人”的实践命题。它引导教师深耕专业领域，提升教学创新能力，与民族地区对高阶教育能力的需求高度契合。

（三）文化属性：厚植情怀底色

“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指向“培养什么样的人”的目标。这要求教师在民族地区既要传递知识，更要消除文化偏见、唤醒民族自信，而这正是当前教师情怀培育的核心方向。

这种契合性决定了：教育家精神既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导航仪”，为其提供价值引领；教师的实践探索又能反哺教育家精神的本土化，形成“理论-实践”的良性循环。

三、赋能路径：从理念到实践的转化策略

基于民族地区实际，需从四个维度推动教育家精神落地生根：

（一）以精神重塑更新教育理念

一是典型引路。挖掘青海刘让贤等本土优秀教师案例，提炼各民族团结爱国的文化资源，让教师在身边榜样中感知教育家精神；二是减负赋能。通过优化管理流程减少非教学任务，保障教师每周至少4小时自主学习时间，为理念转化提供空间；三是制度保障。建立教师参与社区文化建设的激励机制，将教育家精神践行情况纳入评优考核，推动理念具象化。

（二）以结构优化夯实知识基础

一是补短板。联合高校开展定制化培训，重点强化学科本体性知识，填补民族教育学、民族心理学等空白领域；二是强特色。系统开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帮助教师理解各民族文化共通性，提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育能力；三是跟前沿。将数字教育技术纳入必修内容，依托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实现知识体系的迭代升级。

（三）以能力进阶突破实践瓶颈

一是聚焦关键能力。开展“数字技术+课堂”专项研修，确保80%教师能熟练运用智能设备开展教学；二是培育反思习惯。建立“教学日志-月度研讨-年度总结”的反思链条，破解“因学生要求低而忽视改进”的惰性；三是提升研究素养。通过“问题即课题”模式，引导教师从教学困惑中提炼研究主题，两年内实现校本科研全覆盖。

（四）以情怀培育筑牢职业认同

一是价值彰显。弘扬尊师重教传统，通过“最美乡村教师”评选等活动，提升教师社会荣誉感；二是梯队建设。实施“青蓝工程”，让资深教师以“教育家精神”带教青年教师，形成“以优秀培育优秀”的良性循环；三是文化浸润。将“胸怀天下、以文化人”融入日常教学，引导教师在消除民族文化偏见、培育民族自信中实现职业价值。

教育家精神赋能民族地区教师发展，本质上是让“精神之光”照亮“实践

之路”。在教育强国建设的征程上，民族地区教师既要成为知识的传播者，更要做文化的传承者、精神的引领者。唯有如此，才能在艰苦环境中坚守教育理想，让每个民族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根基。

谢谢大家！

发言嘉宾：冉亚辉 重庆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院长、教授

发言题目：《教育强国的基本点在基本纲要》



尊敬的各位同仁：

大家好！我先念几句毛主席的原话：第一，基础教育强国基本点是教育；第二，主席说“基础教育搞得越扎实，教育强国步伐就越稳，后劲就越足”；第三，也是他最重要的一段话，“夯实学生的知识基础，激发学生崇尚科学、探索未知的兴趣，培养探索性、创新性的思维品质”。

首先，我想强调今年基础教育是最重要的。我认为，基础教育决定了国民整体的基本素质，这既包括基本知识、基本技能，也包括基本价值观。实际上，国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既要注重高端，更要夯实基础。大城市要做好，民族地区也要做好，只靠一方面肯定是不行的。

第二，基础教育在知识、能力和思维上奠定了学生个体发展的基本倾向。我

看到一段话后确实很震惊，说得特别好：“无论怎样强调教学质量以及教师质量的重要性，都不会过分。”今天在听关于人工智能的内容时，我特别注意到其中提到要发挥教师的作用。学生的学习态度、想象力在基础教育的早期阶段就已经形成，在这个阶段，教师无疑起着决定性作用。我们搞教育的人，包括国家政策制定者，常常会想到创新人才的培养。但天下哪有那么容易的事？创新人才的培养，如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是长期孕育发展的结果。只有在鼓励创新、崇尚创新的基础教育环境中，才能诞生大批创新人才。但这太难了，就拿重庆来说，大家都知道我们有些成绩好的学生，这次据说有四五十个考上了清北，但我们内部人都清楚，其实主要靠两点：一是大量做题，二是拔尖培养。这其实没什么意义，说实话，过度追求这些，清北的意义也就不好说了，各地其实都存在类似的情况，这点我就不多说了。

第三，基础教育在国民政治思想道德领域塑造了整个社会的精神气质。如果基础教育在精神领域的教育不到位，国家很可能会出现深层次的问题。我们常说科技不发达会挨打，但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如果政治思想领域存在问题，国家内部也会动荡不安。

说实话，生活在中国，我们真的很幸福。去别的国家，比如欧洲，几十个国家语言不通、文化习俗不同。不要以为欧洲人英语都好，我去意大利旅游时，跟服务员（很多是老太太）讲英语，她们连1到9的英文都不懂。这种情况下，做生意太难了，卖个几十万的东西，沟通起来简直让人头疼。而中国，文化价值观的统一是巨大的优势。

下面说四个基本要求，这是我总结的：一是夯实基础，二是尊重天赋，三是宽容差异，四是全面育人。

夯实基础，重点是建构好学生的知识基础。总书记有句话可能大家没太关注，他说“学习是学生的主要工作”，可见他在任何时候都重视知识，强调学习是学生的本职工作，是最重要的工作。依托班级授课制建立的现代学校，无疑是人类的伟大发明。依靠学校，人类实现了知识的代际传递，像经典力学、直角坐标系

这些人类上千年才探索出来的成果，现在初中生就能学习掌握，这是很了不起的，这点就不多说了。第二，建设高质量的教材体系是关键，而这也是当前存在的大问题，在座各位应该都有体会。教材越变越厚，课程越来越多，这是很要命的。而且学生不看教材，搞那么多内容有有用吗？说实话，没多少用。中国要是能出现伟大人物，把教材变好、课程减少就好了，但背后涉及无数的利益纠葛，要达成共识太难了。现在教程越来越多，内容越来越繁琐，学生学业负担严重，可学完之后用处并不大。

第二点，尊重天赋的关键是尊重个体的多元化发展。教育应该是有趣的，我引用过一句话：“学习可以，也应该是有趣的”，这种乐趣类似登山过程中的乐趣，而不是坐缆车登顶后坐享其成，那样学习就没意思了。所以基础教育不要刻意搞得那么苦，刷题的苦，该吃的吃，不该吃的就没必要吃。一定要珍惜青少年创新发展的可能性，把可能性转化为创新成果。尤其要珍惜青少年的个体天赋。我想说，很多人想“大树下面好乘凉”，但大学里面没有那么多“大树”（大师）。在科学领域，几乎没有哪个天才是诞生在另一个天才的光环下。所以如果没处在“大树下面”，反而可能是件庆幸的事，也许自己能成长为“大树”，这就是要珍惜青少年个体天赋的原因。从历史来看，毛主席这样的人能成为军事家，就是因为其个体天赋得到了发展，形成了相应的机制。

第三，宽容差异，核心是树立科学的成才观。总书记说不要用同一标准去给学生贴标签，这点不多说，大家都懂。其次，宽容差异既是发展学生，也是保护学生。上午孟书记（孟老师）的一个观点和叶朗老师的观点一致，我通过访学也和叶朗老师交流过，我们都认为，很多时候，人的优点和缺点是一体的，改正缺点可能会连同优点也丢掉。比如一个勇敢的人，往往也比较莽撞，要是让他变得谨慎，可能就不再勇敢了。所以宽容差异很重要。宽容差异才能培养个性，千人一面、千校一面绝不是教育强国的追求。第四，全面育人的目标是确保学生健康人格的培养。做父母的都知道，孩子一辈子最重要的是健康幸福。考上北大就一定好吗？要是考上北大的学生回家把老妈杀了，那又有什么意义？关键是精神健康、身体健康，最终能过幸福的生活，我们的教育要给予学生这些。

总书记高度重视思想认知的正确性。另外，毛主席在《毛泽东文集》里有段话，我看后深有感触，他说：“不要把青少年说招生的那些人不要天天去乱吹，不要把学习吹得那么轻松，不要把他们弄得像温室的花朵，不然出社会是要犯大问题、大错误的”，温室里的花朵经不起风雨，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现在招生时，不也存在这种“乱吹”的情况吗？“只要来我们专业，未来一定有好工作，人生一定幸福”，这可不是开玩笑，是实话。全面育人，在新时代物质富足的背景下，和我们那一代不一样了。以前跟我们说“努力读书，以后有工作、有饭吃”，大家就会拼命努力；现在跟青少年这么说，他们根本不当回事。

我到西双版纳带学生时，那里有些学生成绩只有二三十分。我们问当地老师怎么不跟学生说“读书改变命运”，老师笑了，学生则说：“老师一个月才3000块钱，我们本地割橡胶一个月能赚一万多，哪里需要靠读书改变命运？”所以，今天的青少年不能成为温室的花朵，我们必须培养他们的意志力和正确的理想信念，这一点的重要性，大家都清楚。

当前教育存在的问题有以下几个。

第一个是教育的异化，总书记说这是教育最突出的问题：中小学生太苦、太累，课业中的一些做法太短视、太功利。更严重的是，大家都知道这种状况不对，却还沿着这条路越陷越深，这就是内卷，大家都卷，你不卷也不行，可教育本身是育人的，不是为了考试，这点不多说。

第二个是教育的机械化，标准化太可怕了。我们处于工业化时代，连教育也像工业化一样搞标准化。我一直呼吁把工业化模式的教育改成农业模式的教育。农业模式下，再厉害的老师也只能把水稻种成水稻，不能把玉米种成水稻，这就是尊重孩子的天赋。老师最多能做的是捉虫、施肥、浇水，不能把土豆变成番茄，所以要尊重孩子的天赋。

第三个是教育的无趣化和规训化，学生“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还总被说“我是为你好”。最近不就有这样的事吗？家长以“为你好”的名义绑架孩子，这不利于教育强国的生态建设。构建良好教育生态，一要目标长远，二要遵循教育规律，

三要拓展教育视野，认识到教育是一辈子的事业。重点要做到这四点：一是健康，没有健康什么都谈不上；二是幸福；三是正确，这点不用多说；四是公正，这是教育的基本点。我身边有个朋友，她女儿一直是年级前几名，却在老妈的高压下抑郁了，休学了一年，为了成绩搞成这样，真的没必要。

基础教育既要重视能力培养，也要重视品德教育。我有个观点，不知道各位老师是否同意：教育和教学是有区别的。德育方面，不能靠灌输把孩子培养成反人类的人，这是肯定的；而教学一定要尊重孩子的天赋。两者必须区别开来，否则一定会出问题。

发言嘉宾：朱晟利 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院长、教授

发言题目：《面向新师范的西部教育学类专业人才培养改革探索与思考》



尊敬的各位同仁：

大家好！我认为面向西部的教育振兴，教师队伍建设十分重要。我想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教育学类专业人才培养改革的问题，二是我们学校的一些探索，三是一些思考。

关于教育学类专业人才培养改革，其背景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是西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求。刚才青海师大的李院长也提到了

相关内容，这涉及三个层面：一是师资的整体质量，二是教师的能力与文化适应问题（即教师教育素质如何应用的问题），三是教育公平面临的挑战。当前教育现实中，尤其在西部民族地区、农村地区，教育公平问题十分突出，解决这一问题非常迫切。

第二个是新师范理念对传统模式的革新。我们常提“四星”，但“四星”建设离不开“新师范”，因为没有好老师，一切都无从谈起。新师范是新时代教育变革背景下形成的新型教师培养体系，在理念、模式、技术、评价等方面都进行了系统性革新，比如借助AI技术在培养目标上聚焦教育创新者和变革引领者的培养；在实践模式上强调全程化、多场景、沉浸式体验；在技术赋能上注重通过技术重构教育生态；在协同方面推动多方合作；在评价上则从过去“考个证书就行”转向强调成长与增值。

第三个是最关键、最实际的背景：传统师范教育存在“重知识、轻实践、缺创新”的问题，这里不展开细说。我想补充一点，教育学类专业人才培养中，教育实践对教育理论的示范性一直是个难题。师范院校的教育学院（或教育科学学院）本应是最具师范特色的学院——不仅培养人才，还研究培养方法，人们对它也有更高期待，认为它能成为教育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典范，但事实并非如此，甚至有时让人觉得其教育理念还不如一些基层实践。所以，教育学院的人才培养践行自身信奉的教育理论，不仅是为了明确其在师范大学中的定位，更是为了让教育学更有意义，尤其是避免教育学研究者“说一套做一套”。比如我们强调学生主体性，但有些老师在教学中并未真正落实这一点。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做了一些改革探索：

一是明确培养目标。结合教育学专业“理论与实践并重”的特性，以陶行知“教学做合一”思想为核心，融入现代教育理念，突出师范的示范性，构建“师德引领、实践驱动、知行合一”的培养模式，旨在培养“能上课、会育人、善研究”的基础教育师资。我们学院有教育学、学前教育、小学教育和特殊教育四个专业，均围绕这一理念推进改革。

二是构建“理论与实践并重”的课程体系。我们将总学分从170压缩到146，目的是把时间留给学生。这一过程中，我们面临精简课堂、精选课程的巨大挑战，但最终通过整合部分课程实现了目标。在课程内容上，我们以教育学专业的课程理念和分类为基础，注重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的优化整合，整体体现理论与实践的融合。

三是打造“学用结合、知行合一”的教学模式。一方面聚焦知识的“学用价值”，强调知识学习与实践应用的结合，具体包括：推进基于前置学习的问题解决式课堂教学改革（要求老师课前给学生布置问题，围绕问题展开教学）；推行项目式学习常态化（设立项目式学习学分，在“教育研究方法”等课程中，以4-6名学生为一组，开展3个学期的训练，并采用过程性考核）。另一方面设计“四年一贯、多场景联动”的实践教学链：大一到大三进行见习和研习，其中有一年专门开展微格训练（邀请幼儿园和小学老师参与，以10-15人为一组进行训练）；大三下学期安排实习（原本是大四上学期，调整后学生实习结束返校后，大四上学期还有时间巩固提升），通过这种方式促进理论与实践结合。我们还定期开展基地研讨，每年小检、四年大检时都会邀请24个基地的领导和老师，分组与各专业联合研讨人才培养方案，深入了解基础教育对师资的需求。

四是推进第二课堂改革。开展丰富多彩的学生活动，比如每年评选“教科五星”（涵盖团队服务、科研创新、教师技能等方面），并举行盛大表彰，让学生在活动中实现自我价值；组织学生参与科创项目和各类竞赛；为学生配备导师进行指导（此处不展开）。

五是强化教师“知行合一”的示范作用。教师的核心职责是“传道授业解惑”，其中“传道”最为重要——不仅是传授知识，更要以身作则。“师道尊严”的树立，一方面源于教师是道德的化身，另一方面在于“尊道才尊师”，而非因“教师”身份就自然获得尊重。所以，教师要言传身教，成为道德模范的践行者，其言行（包括是否践行自己所讲的教育理论）都应符合“道”的要求。为此，我们从四个方面强化教师的践行能力：一是通过“四德工程”建设，塑造教师高尚人格；二是

倡导“教育性教学”，融入课程思政理念；三是在评价中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四是建设教育质量体系以提供保障。

初步成效方面，师范生的核心素养显著增强，教育实践能力和技术应用能力（尽管仍有提升空间）均有进步；升学和就业态势良好，去年升学率达30%，挂科率仅4%。在软科排名中，西部高校整体排名不高（除西南大学、陕西师大等），我们学院的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专业相对靠前；去年还获得了《中国教育报》等媒体的相关报道。

最后谈谈思考：

一是教育学专业人才培养必须强化与教育实践的深度融合。这既是为了捍卫教育学院在师范大学中的地位，也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基本品德体现。

二是与中小学教师的学科能力不同，教育学类专业人才的优势在于熟悉教育教学理论。正如李院长提到的，很多老师缺乏教育理论知识，而我们的价值就在于此——尤其在幼儿教育和小学教育阶段，学生“听其师才信其道”，而非“信其道才听其师”，这更凸显了教育学理论的重要性。

三是升学与就业并非矛盾。注重教学合一的培养模式，反而有助于提升学生的考研面试能力和就业竞争力。

发言嘉宾：马秀麟 新疆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教授

发言题目：《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西部教师发展的思考》



各位老师，各位领导，下午好！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在这里做分享。刚才已经介绍过，我是来自新疆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的马志林。同时，我还有第二个身份——北京师范大学的老师，2023年到新疆师范大学援疆。今天上午听了很多报告，收获很大，也很有感触。之前的报告大多偏理论，我想换个“口味”，因为我本身是教育技术专业的，分享可能更偏重实践，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另外，这个报告如果在新疆讲，我能讲三个小时以上，今天时间有限，争取15分钟内讲完。后续如果大家有兴趣，我可以把PPT分享出来，供大家参考。

2022年4月，RTP横空出世；2025年1月，Bigchain的II发布。这两个时间点对国内的教育教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也催生了一个词——AIGC（生成式人工智能，也叫人工智能生成内容）。

关于AIGC，刚才付老师已经做了很好的理论讲解，我侧重实践，我们俩的分享可以互补。当前存在两种不太匹配的现象：学术界热度很高，有很多论文和观点，甚至部分非专业人士也一拥而上，其实大可不必，有些论文只是换了题目和内容，就号称和信息化相关；而另一方面，一线教师却很沉默、焦虑，不知道AIGC怎么用、能干什么，甚至不敢用，很多老师觉得AIGC就是个“大玩具”，和传统教学没什么关系。

去年我通过问卷星在新疆地区做了一次调查，收到900多份问卷，剔除800多份无效问卷后，有效问卷有600多份。从数据来看，西部绝大多数一线教师是认可AIGC的，但对于如何让AIGC服务于教学，却比较迷茫。很多一线老师内心渴望用AIGC，却又畏惧、回避，不太愿意向同事请教，担心影响自己的形象。

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帮助西部一线教师解决AIGC赋能教学的问题？这对于实现西部教育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要解决这个问题，得先想清楚几点：AIGC到底能干什么？如果连它的功能都不清楚，就谈不上用好；其次，如何让AIGC帮我们干活？

基于这些问题，我想讲四个重要的点：AIGC与教学的价值、如何高质量使用AIGC、提升赋能质量的关键理论，以及AIGC应用的学术能力问题。

第一个点，AIGC 对老师来说，在未来教学中能做什么？它是一题多解、方案互补的好助手。针对特定问题，我们借助 AIGC 可以生成多种方案，把这些方案交给学生或老师，能让大家评判、思考。它是培养简便性思维的有效工具，也是促进学生从多视角考虑问题的重要工具。换句话说，我们可以用它生成多种方案，比如针对一个问题同时生成 5 种解决方案，品评优劣、多方借鉴，进而生成最优方案。

有很多家长跟我反馈：“马教授，我们家孩子上小学三年级，写作文让我很焦虑。”我就告诉他们：“不用焦虑，你可以换种方式，让孩子通过 AIGC 直接生成 5 篇作文，然后陪着孩子一起分析这些作文的优点，把劣势变成优势。”比如写“秋天”，AIGC 能生成不同角度的作文，我们可以借此引导孩子思考怎么写更好。

第二个，AIGC 是创设认知冲突、激发思维的好方法。借助它，我们可以创设出老师和学生可能根本想不到的情境，激发深入思考，拓展思维。比如论证“1+1 不等于 2”，本身看似是个难题，但借助 AIGC，结合元宇宙等技术，就能找到很多思路。

第三个，AIGC 是教学创新、新教案研发的好助手。很多老师，包括在座的同学们，以后参加公开课、教学创新大赛、柴家炳比赛等，都需要优秀的教案。但我看过很多教案，大多只有内容，没有特点，没有重点埋点，也没有用到小组协作、认知冲突、变式思维等策略，就是从头讲到尾，这样很难获奖。

同学们可以试着用 AIGC 来优化教案，比如让它帮忙设计认知冲突环节、变式思维环节、信息化情境环节，然后把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生成的方案，用简便性思维整合优点，形成更好的教案。不知道各位同学在课研、教学设计中用过吗？

AIGC 还是创建优质教学情境的好工具。我在百度微信引擎上提过一个要求：“为李白的古诗‘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创设一个教学用图。”一开始生成的图我不满意，后来经过调整，得到了更合适的素材。

再比如，小学有个相对运动的问题：“甲乙两地相距 1.07 公里，A 汽车和 B 汽车分别从两地出发……”在腾讯源码上，我让 AIGC 生成一个网页动画，点击“开始”，红车和蓝车的运动过程就很直观地呈现出来，学生更容易理解。

还有物理中的凸透镜成像原理，用网页动画方式呈现，以焦点为参数，生成的网页代码运行后，边上有可拖动的按钮，拖动后能直观展示物镜和目镜成像的大小变化，非常形象。

另外，我还用剪映（PC版）和Dimon给古诗配过视频，效果很好。大家可以试试用big idea围绕古诗生成一段视觉精准的视频。

第五个，AIGC是解决教育问题的策略库和方法库。比如，有位初中教务主任遇到一个问题：学校有两位教学能力都很强的教师A和B，都获过省级教学能力奖项，但两人矛盾很深，因理念差异大，经常发生分歧，导致其他老师很为难。他可以借助AIGC分析冲突原因，找到和两位老师沟通的方法，这对教育管理者来说是很好的支撑工具。

第六个，AIGC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好伙伴。借助智能教师，能辅助我们教学。比如北师大赵国庆教授在微信里做的mind map智能虚拟人“my way”，只要@它，让它做角色设计，就能得到不错的方案，这就是虚拟数字助手辅助教研的体现。

对于硕士生、博士生写论文，AIGC也能帮忙。在新疆师大，我看很多学生的论文，发现他们在文献综述和逻辑主线方面有待提升。如果不太会写，可以借助AIGC：从知网上下载5-10篇影响力高的论文，上传到腾讯源码等平台，让它梳理核心概念、主要观点、策略、研究的贡献与不足，审核后就能为自己的写作提供思路。

AIGC还是年终总结会议发言的好助手。比如作为校长，要求老师在创新性人才培养和思维发展训练两个领域下功夫，让AIGC围绕这个目标写发言稿，能体现“共启育人新篇，铸就思维之光”的理念。

发言嘉宾：杜尚荣 贵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教授

发言题目：《教育强国进程中西南地区乡村小规模学校发展的主要症结与优化策略》



各位同仁，下午好！有幸能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些自己的思考。今天想和大家聊的话题，是我这一年来在乡村学校从事乡村教育学研究，以及近三五年来在国内中小学，尤其是乡村学校走访后的一些感悟。我每年暑假都会去十几所学校转转，而且我本身就是从乡村学校出来的，在乡村小学教过所有课程，所以我身上能看到的问题，基本也是现在乡村教育存在的问题。我想围绕“教育强国背景下相对小规模学校的机遇、挑战和策略”来谈，尽量抓紧时间，把时间控制好。

现在国家越来越强，教育发展也越来越好，但我们的小微规模学校却越办越小，甚至慢慢减少。我20年前待的那所学校，当时有300多个学生，五个老师教着300多个学生，现在从过去的100多人慢慢减少，到现在已经没有了，类似的学校越来越多，慢慢失去了增长空间。但有人可能会想，既然这里教育办不好，让孩子们去好学校不就行了？这只是理想状态，现实中存在很多问题。现在我们村里有好几个上一年级的孩子，每天要走好几公里的路去上学，家长每天接送。咱们在市区开车堵一会儿都觉得累，老百姓来回要两个小时，耽误了多少农活啊？尤其是插秧那几天，根本忙不过来，这都是很现实的问题。所以，小规模学校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它在解决民生问题上，体现了教育的人民属性，要考虑人民对幸福的需求，所以这样的背景下，小规模学校值得关注，也必须关注。

在推进教育强国的过程中，小规模学校也迎来了很多机遇。其实机遇一直都有，

只是乡村学校处境艰难，长期以来没能抓住。而在当前教育强国的背景下，有了新的启发、思路和想法，我们要抓住这些机遇，留住乡村小规模学校。从激励层面来说，有政策上的支持，比如陈阳一直提到的教育数字化，在《教育强国建设纲要》里也有相关内容，对乡村学校发展是有支持的。

从政策激励来看，现在有大量支持乡村学校发展的政策，在教师队伍建设上尤其强调，要打造高素质、专业化的教师队伍，这不只是针对城市学校，乡村学校的老师也要向高素质、专业化发展，不仅要补充数量，更要提升质量。

现实中，城乡一体化发展取得了很多成果，也为乡村学校提供了发展素材，这也是一种激励。尤其是数字化，刚才马院长讲得很好，那些技术对乡村学校太管用了，多教给乡村学校的老师，看看能不能改进教学方式，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虽然我们不可能让每个乡村老师都成为教育家，但教育家精神完全可以在乡村学校扎根，在每个老师心中扎根，启发他们发自内心地重视教育，这也是很大的一种激励。

从现实挑战来看，主要有这几个方面：

一是学生整体素质比较薄弱。有个不太好说的数据，贵州有个区域的小学数学平均分只有30分，这很值得我们思考。所以贵州从省委层面推出了“数学强基计划”，专门提高数学成绩，因为数学是基础，数学不好，以后很多学科都学不好。

二是教师教学能力滞后。我们和老师交流时发现，他们最喜欢的教学方式是拿着书讲。虽然有电子白板，但有的用不上、不会用，觉得拿书讲最方便，所以整体教学能力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三是家长在“教”和“养”上比较欠缺。乡村学校因为家长要搞经济建设，留守儿童比较多，家长在教育上存在缺位。

四是社会帮扶没有真正改变教育质量。很多时候只是提供经济资助、设施设备，没有调动起学校和学生内心的力量。

五是学校管理还有很多不足。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提出五个策略，希望能优化和提升小规模学校的发展：

一是优化教育政策，最好能有“一校一策”的发展思路，这是可行的。就像高中应对新高考，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课程方案，小规模学校也可以制定自己的发展方案。

二是今年7月成立联盟，让学校们团结起来，共同发展。

三是打造平台，弥补短板。就像马院长讲的技术，教给乡村老师很有必要。我们贵州师范大学有个“5G+乡村教育”平台，让几十个乡村学校同步共享资源，比如我现在在这里讲，他们那边就能同步参与，真正实现“让乡村的孩子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教育”。

四是建立教师共享机制。乡村的公路这几年修得很好，老师骑摩托车十几分钟就能到另一所学校，实现教师共享是可以的，能弥补学校间教师和学科的差距。

五是开发乡土文化课程。如果用知识、成绩来衡量乡村学校，确实很难，毕竟像刚才说的平均分三十几分，提升起来不容易。但乡村学校有自己的优势，挖掘这种独特性，开发文化课程，能发挥他们的优势。

建设教育强国，基础教育是基点。没有西部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就不可能有中国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没有西部每一所乡村小学的发展，也不可能有中国教育的现代化。

发言嘉宾：徐亚峰 西藏民族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教授

发言题目：《构建边疆地区高质量教师教育体系》



尊敬的各位同仁：

下午好！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边疆地区，国家定位为特殊民族边疆地区。我们在做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构建边疆地区高质量教师教育体系，这源于我们教育学院这两年面向地方、面向民族地区的一些探索。

前两天我们去一所师范专科学校交流，这所学校的二级学院在三年前的高峰期，在校生有 7000 人左右。

第一个，刚才何老师也提到，教师队伍建设对边疆地区来说确实至关重要。第二个，这两年边疆地区从边缘走向中心，源于国家对边疆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视，边疆地区的重要性前所未有地提升，很多重大问题都有明确要求。但有一条路线研究得比较少，就是电商相关的，个人建议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西藏大学是西藏第一所高校，也是西藏高校中第一个建立教育学院的，具体进展就不多说了。为了节省时间，我定了 10 分钟的闹钟。

第二个方面说说现实困境，以西藏为例。北师大的赵英和朱旭东老师提出了四个体系，即教学体系、学术体系等，可作为思考框架。对边疆地区来说，我觉得数据治理是第一位的，也是最缺失、最重要的。

举几个例子，第一个是供需问题。这两年教师招聘人数断崖式下滑，大家都知道人口等因素的影响。比如西藏 2020 年不算工会实习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和

定向招聘的教师大约有 3000 人，到 2024 年就降到了 1100 人，今年整个西藏只招 500 个老师。但与此同时，我们西藏的三所高校，包括西藏大学，每年培养的师范生规模一直保持在 5000 人左右，本科就业压力很大。

还有一个情况，刚才有附中的专家提到了文科，总的来说，西藏的孩子们比较喜欢文科，理科生相对少很多。在教育强国政策背景下，今年理科教师岗位明显增加。更让人忧心的是，我们发现西藏民族大学教育学院的藏族研究生，在求职时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有的研究生本科是数学或外语专业，但招聘方会觉得他们不是研究生阶段的对应专业，而招聘要求往往是大专及以上学历。西藏的大专录取分数线较低，很多在 100 到 200 分之间，这其实是治理层面的问题，不是缺高质量人才，而是治理存在短板。

再举几个简单例子，第一个是学历问题，专科在招生和招聘中占比整体超过 50%，学前教育更是高达 70%。前十年，很多合格的教师被分配到公园工作，在西藏，这是很普遍的现象，这对一线教师培养影响很大。

第二个是专业结构问题，高质量师资供给严重不足。比如六所部属师范大学在西藏的师范专业每年毕业生也就 100 人左右，其中很多人还转行了，能真正留在西藏从事教育相关工作且能联系上的不多，还涉及到后续发展等问题。

教研体系几乎是空白，首先没有足够的专业教研人员，也没有完善的机制。县里合格的教师没几名，很难开展教研工作，有的幼儿园甚至只有一名老师。

学术体系方面，我们目前主要面临援藏等相关问题。大家都知道，西部地区条件艰苦，各有各的难处。

关于教育强国建设，我们有个基本思路，我画了一个图，图中四个治理体系是我们的内生动力，未来发展主要还是靠自己，但光靠自己也解决不了所有问题。

举个例子，西藏有特殊政策，西藏民族大学教育学院约 1000 名在校生（包括本科和研究生）都不用交学费。特别是农村生源，不管是从陕西、山东还是河南来的，只要考上西藏的师范生试点专业（西藏有 9 个试点专业，在校生 2500 名），不仅免学费，每月还有 400 到 500 元的生活补助，住宿费也全免。但我算了一下，西藏的一些旅行社，即便有这样的政策，年轻人想当老师也不容易。还有很多内

地来的研究生，我们给他们上课的时候发现，90% 的人从来没想过回西藏就业。

现在组团式援藏是个热门话题，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这项工作取得了不少成效。但组团式援藏通常是一所学校派十几个、二十个老师，为期三年，目的是整体提升学校水平，最核心的应该是发挥引领辐射作用，带动当地教师成长，就像马老师他们去支援时做的那样，高校在这方面有一定优势。比如西藏的教育发展，没有好的教师队伍是不行的，制度建设非常重要。但在教师教育传承方面，一些援藏政策有时会陷入历史循环的怪圈。比如派 20 个人去支援，目标是让内地西藏班多考几个人，让数学平均分提高 3 到 5 分，这本身没错。

但有个问题值得思考：我们的很多老师，到底是不会用、不想用还是不愿用先进的教育方法？他们真的愿意投身教育事业吗？这可能是另一个话题。我们常说“最优秀的人来培养更优秀的人”，但如果一个人是因为没有其他工作选择才当老师，我们能指望他具备教育家精神吗？这很现实，也和我们的治理工作方方面面都息息相关。

在西藏，高考理科数学能考 100 多分，那真的很优秀了。我觉得这样的孩子如果愿意来小学教育专业当老师，是很有潜力的。

发言嘉宾：王安全 宁夏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教授

发言题目：《西部乡村教师队伍高质量发展制约因素及其负向功能的克服》



尊敬的各位老师：

大家好！我今天要讲的内容，结合咱们整个报告的设置来看，上午和下午的内容截然不同，上午主要研究教育强国的问题，下午则围绕西部教育展开。因为咱们这个报告的设计本就是两部分——教育强国建设和西部教育高质量发展，所以上下午的内容也很好地契合了今天的主题。我要讲的是关于怎样建立以需求为导向的西部乡村高质量教师队伍的建设问题。

我是倒数第二个发言的，后面就是我们的“老东家”了，能在这个时候和大家交流，我感到非常高兴。我谈的这个问题，主要从教育需求入手。教师队伍要高质量发展，总书记曾说过，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十八大以来，乡村地区对教师教育的需求已从数量转向质量；二十大以来，江苏地区对教师教育的需求更是从一般性质量走向了高质量。二十大报告中特别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实现高质量发展，而高质量发展就是要从关注规模、速度，转向关注差异性和质量性的根本性转变。

一、教师队伍高质量需求的情况

2018年到2022年，我们对西部地区3000多名学生做了调查，结果如下：

从教师结构需求来看，乡村中心学校、偏僻学校和城镇周边地区存在差异。城镇周边地区更倾向于专科性教师，而乡村偏远地区则更需要全科性教师。

从教师年龄结构来看，不管是偏僻地区、中心学校还是城镇周边学校，普遍倾向于青年教师，但这些年乡村偏远地区的青年教师数量远远不足，老教师数量相对较多。

从教师性别比例来说，总体而言，乡村地区更需要女教师，对女教师的需求也比较迫切，实际情况也是乡村地区女教师比例相对较高，这也符合学生的学习需要。

从专业结构来说，去年乡村地区对师范专业教师的需求占比不到10%或15%以下，其实更希望有更多师范专业的教师。

二、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刚性编制对教师队伍高质量发展影响很大。我们在调研中发现，乡村地区特别需要公费师范生，按照规定，公费师范生一般要回到原基地服务1到2年，但实际上有不少公费师范生无法回到原基地服务，原因就是没有编制。比如宁夏师范大学最早毕业的一批公费师范生，不少都去了银川地区，就是因为乡村地区没有编制。

硕士教师既缺乏又难以普及。我们了解到，宁夏南部山区的硕士教师极其缺乏，比例极低，甚至达不到10%，一些乡镇甚至不到1%，但又因为兼职限制，难以普及硕士教师。

缺乏音体美教师，且难以让他们专门从事相关教学。不少乡村地区的音体美老师不足三名，却不能专门教音体美，必须要带语文、数学这样的主课。因为在乡村地区，人们认为主课最重要，觉得让音体美老师带副课是“浪费”，所以必须让他们带主课，这严重影响了教师队伍的专门化和高质量发展。

三、教师配置方式对教师队伍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政府配置和学校自主配置的问题。以往办学中，政府配置比重较大，现在城市地区政府配置在减弱，学校自主配置在加强，尤其在一些乡村学校和城镇周边撤并学校的过程中，学校在选用教师时自主权在加大，但这并不意味着自主权加大就一定能带来高质量发展。因为学校在选用教师时，会有自己的考量，比如是选年轻教师、中年教师还是有职称的教师，他们可能担心引进高质量教师后，对方很快退休，或影响本校教师评职称等，这些考量不一定符合学校长远发展。

计划配置和市场配置的问题。我们长期关注计划配置，对市场配置关注不足。但实际上，在以学校需求为导向的情况下，要在宏观计划指导下，尊重家长、学校、学生等市场主体的需求。

教师流动对教师队伍质量发展的影响。教师队伍到底是要在流动中发展，还是在稳定中发展？以往我们非常关注乡村教师队伍的稳定，认为不稳定就没有质

量发展，但实际上，乡村教师队伍发展的重点不是稳定，而是流动，流动问题导致了队伍发展中的诸多问题，特别是流动的单向性和单一性影响了高质量发展——流动出去的多是有水平、有质量的教师，而质量不高的教师却流动不出去，影响了流动的平衡性。所以乡村教师队伍的发展不是要追求稳定，而是要实现合理流动。

乡村教师队伍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问题是结构的不合理流动，即老中青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专业结构、职称结构等存在不合理流动，只有合理流动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

四、结论

所以我们最后提出，要建立以需求为导向的西部乡村教师队伍，特别是在乡村教师队伍发展中要注重分类施策，根据边远地区、乡村中心学校和城镇周边地区学校学生对教师的需求，为他们配备合适的教师。

我要说的就是这些，谢谢各位。

发言嘉宾：赵丹 陕西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教授

发言题目：《优质均衡背景下西部乡村小规模学校资源优势利用的理论模型与实现路径》



尊敬的各位老师、同学们：

大家下午好！我汇报的主题是长期关注的乡村小规模学校发展，从资源优势利用的角度，分四个方面简要分享。

第一个方面，最新发布的教育领域两个重要公告中，专门提出“办好必要的小学校”。其实长期以来，党中央一直非常关注这类学校的发展，很多政策都有所涉及。

另外，近两年大家能明显感受到，人口变动和少子化时代已经来临。从人口规模增长率和多省份进入少子化社会的数据来看，除少数省份外，0-14岁人口占比均已降到20%以下。同时，我国0-14岁人口向中心城区集聚的特征很明显，乡村0-14岁人口已进入负增长时代。这些数据网上都能查到，这里做个相关背景介绍。

乡村人口向城市集聚的趋势非常明显，随之而来的是全国小学和乡村教学点这类小规模学校数量持续减少。

我们课题组对很多省市进行了调研，其实我在研究生阶段跟着导师潘天佐教授就长期研究农村教育，做农村教育研究感觉时间过得很快。近几年，我们在云南、陕西、内蒙等地调研时发现，小规模学校数量越来越少，分布也越来越分散。而且不仅偏远乡村有小规模学校，在乡镇核心地带，甚至一些山区的乡镇中心学校，规模也在变小，有的学生少于200人，甚至少于100人。

现在学界正在呼吁，能不能将300人以下的学校也界定为小规模学校，以促进其发展，这也是我们调研中在思考的问题。目前学界对小规模学校高质量发展的背景、困境和对策已有大量研究，也发表了很多高水平文章。

我们的研究采用混合式研究方法，从定量和定性两个角度，对中西部地区的中小学，特别是小规模学校进行了问卷和深度访谈调查。首先进行理论挖掘，我本身是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的，博士阶段主要研究方向是教育经济学，所以长期以来挖掘了一些经济学理论。比如1959年的企业成长理论，到2001年，有教授对资源基础理论进行总结，提出组织中优势资源的异质性特征可概括为价值性、稀缺性、不可完全模仿性和组织性四个特点。后来，教育学、管理学领域的学者将这四个特点迁移应用到教育现实问题的阐释和解决中。

将这些理论与乡村小规模学校发展相结合，二者能紧密联系。我国乡村小规模学校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特殊的价值，能保护最贫弱、最弱势人群的教育机会；二是特殊的办学形式，因规模小、班级规模小，教学组织形式特殊；

三是服务对象为乡村弱势儿童，所处区位在乡村及较偏远地区；四是与乡村社区全面振兴紧密相关，这也是党中央非常关注的。

在特色化发展道路上，可挖掘并利用乡村小规模学校的资源优势。结合资源基础理论，总结出一些资源优势，同时与教育高质量发展、教育质量要素相对接，从六个方面梳理：社会效益、物力资源、教师知识资源、课程与教学资源、组织资源、文化资源。这六个方面耦合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教育质量框架，也符合我国在优质均衡发展阶段提升教育资源配置、转变发展方式的政策要求。

接下来汇报这六个维度资源优势利用的路径。

第三个方面即服务对象为乡村弱势儿童，所处区位在乡村及较偏远地区，通过对广大中西部乡村小规模学校的实地调查，发现它们在资源优势利用上存在一些现实问题：

一是财力资源紧张，经费核算标准导致办学效率优势不足。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发现这一问题，我们的个案调查也显示，很多小规模学校的财政经费难以满足需求，而以百人为标准的底线规模核算方式，忽视了10人、20人、30人、50人等超小规模学校的需求，它们和100人、200人的学校资金需求不同。

二是物力资源配置方式导致利用效率、效能偏低。目前仍以政府为主导的资源供给方式，而联合国组织一直倡导跨界供给公共产品，我们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充分。

三是教师资源质量有待提升，本土教师的潜在优势未充分挖掘。正如王安全院长所说，乡村地区教师在质量维度还有不少欠缺。同时，小规模学校本可采用复式教学、项目式教学等方法适应小班教学，但调查显示，教师认为自己复式教学能力不足的比例很高。

四是课程与教学资源内容特色不足。虽然“开足开齐课程”的情况已有改善，但“保质保量开设所有课程”还有待提升，在地经验性和特色课程的资源优势发挥不够。

不过，通过案例挖掘发现，尽管很多地区的小规模学校资源优势利用不足，但仍有一些典型区域有独特经验：

一是部分学校成本和效益优势发挥较好，因就近办学，当地孩子上学成本大幅降低。

二是一些地区通过村校融合改善物力资源，比如村委会给学校提供耕读场地等。

三是小规模学校的老师拥有丰富的乡土知识和乡村教育情怀，因时间关系不赘述。

四是大学帮扶项目课程及特殊教学模式应用较好，比如甘肃一些地区。

五是扁平化组织结构及人本管理优势明显，比如陕西一些小学民主管理氛围好，校长在管理上很下功夫，值得提倡。

六是与乡土社会紧密联结的在地性文化资源优势突出，特别是民族地区，如贵州、云南将大量民族歌舞引入体育、音乐课，效果很好。

最后，结合案例和理论总结，提出实现路径：

一是基于全成本视角客观评价并持续发挥小规模学校的教育优势。长期以来，学校办学成本核算仅考虑校内人财物运行成本，从教育经济学理论来讲，学生家庭成本等校外成本也应纳入。从全成本视角看，小规模学校的办学成本很低，这取决于核算方式。我们已就此向政策层面提交报告，反响不错。

二是跨界合作促进教育资源改善。应超越政府单一主体供给资源的方式，引入社区公益组织、学生家长、高校等各类组织共同提供办学资源。

三是建构跨学科主题课程与多元教学模式。这契合我国最新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小规模学校学生数量少，便于根据需求设定跨学科学习目标、主题任务，融入项目资源，空间很大。在多元教学模式上，除学术研究倡导外，我们也正和博士、小规模学校合作，通过公益性服务帮助他们推进项目式教学和复式教学。

四是培育融合线上知识与地方性知识的乡村教育家。很多乡村老师有乡村教育情怀，并非都想离开。应涵养其地方性知识，增强现代化知识与地方知识的统合能力，以教育家精神为引领，提升乡村教学能力。

五是建构愿景促进型的组织结构并赋能。这是未来学校和企业组织管理模式

的方向，要让小规模学校的校长、教师、学生有共同愿景，在组织管理中创造共同体共同管理的氛围和路径。

六是与乡村社区嵌入式融合发展，促进文化资源创生。从关系性嵌入、结构性嵌入、文化性嵌入和环境嵌入等维度，推动小规模学校与乡村社区融合，让在地性资源真正为学生发展发挥作用。

我主要汇报这些，谢谢大家。

论坛闭幕式

总结讲话

李 蓬 长江教育研究院执行副院长



尊敬的各位领导、专家、学者们：

大家下午好！在全体与会者的共同努力下，“2025 西安·长江教育论坛”即将圆满落幕。首先，我谨代表长江教育研究院，向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陕西教师发展研究院等主办单位的精心筹备，向各位专家学者的深度参与，以及会务组全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致以最诚挚的感谢！

本次论坛以“贯彻落实《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与西部教

育高质量发展研究”为主题，看似聚焦地域议题，实则承载国家战略使命。在开幕式上，董治宝副校长和周洪宇院长的致辞，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了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意义和紧迫性，也让我们明确了西部教育在教育强国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责任。

在主旨报告环节，我们有幸邀请到了众多教育领域的专家学者，他们从不同角度对教育强国建设进行了深入解读和探讨。袁振国教授对数字化之于教育强国建设的决定性意义进行了深刻阐述，让我们看到了数字化在教育领域的巨大潜力和发展空间；周洪宇教授对《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解读，让我们对规划纲要有了更加清晰和准确的理解；孟繁华教授对高质量人才培养如何转化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为我们培养高素质人才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邬志辉教授对强国教育学与英才教育进行了深入探讨，为如何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提供了思路；朱德全教授对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中国道路”进行了详细阐述，为我们职业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顾建军教授对工程技术人才培养体系建设与教育高质量发展进行了深入分析，为我们培养工程技术人才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徐晓东教授则从教育信息技术的角度，为我们展示了如何以教育强国建设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这些精彩的主旨报告，不仅让我们对教育强国建设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也为我们西部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下午的主旨报告同样精彩纷呈。李莉女士分享了海亮教育科技服务集团在县域教育高质量发展方面的实践经验，为我们提供了可借鉴的案例；付卫东教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与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进行了深入探讨，让我们看到了人工智能在基础教育中的应用前景；王安全教授对西部乡村教师队伍高质量发展制约因素及其负向功能的克服进行了详细分析，为我们解决西部乡村教师队伍建设问题提供了思路；李晓华教授对教育家精神赋能民族地区教师专业发展的价值逻辑与实践路径进行了深入阐述，为民族地区教师专业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冉亚辉教授对教育强国指向的高质量基础教育基本要求进行了深入分析，为我们基础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明确的方向；朱晟利教授对面向新师范的西部教育学类专业人才培养改革探索与思考进行了分享，为我们培养高素质教育人才提供了新的思路；马秀麟教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西部教师发展的思考进行了深入探讨，为我们教师发展提供了新的视

角；杜尚荣教授对教育强国进程中西南地区乡村小规模学校发展的主要症结与优化策略进行了详细阐述，为西南地区乡村小规模学校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许亚锋教授对构建边疆地区高质量教师教育体系进行了深入分析，为边疆地区教师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明确的方向；毛红芳教授对“教学论”在中国的意义流变与学科话语体系发展历程进行了深入阐述，为我们教育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赵丹教授对优质均衡背景下西部乡村小规模学校资源优势利用的理论模型与实现路径进行了详细分析，为我们西部乡村小规模学校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这些精彩的报告，不仅让我们对西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各个方面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为我们解决西部教育发展中的实际问题提供了宝贵的思路和方法。

论坛的成功举办，离不开各位领导、专家、学者的积极参与和智慧贡献，也离不开会务组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在此，我再次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我想说的是，虽然本次论坛即将结束，但人们对教育强国建设的探索和对西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追求永远不会停止。让我们携手共进，以本次论坛为新的起点，继续深入贯彻落实《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为推动西部教育高质量发展、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谢谢大家！



长江教育研究院

长江教育研究院是中国知名社会智库，是在湖北省教育厅的大力支持下，由华中师范大学和长江出版传媒集团联合发起，于2006年成立的教育研究机构。院长由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周洪宇担任。长江教育研究院致力于教育领域重大战略问题研究与决策咨询，率先提出“全球视野，中国立场，专业能力，实践导向”的主张。长江教育研究院“立足湖北，辐射华中，影响全国”，本着“民众立场、建设态度、专业视野”的立院原则和“工作研究化、研究理论化、理论实践化”的工作思路，聚集了一批国内外知名教育专家，搭建了一个以文化出版企业为依托、联系相关教育专家和教育管理部门的平台，形成了以学术研究为基础、政策研究为重点、出版企业为依托、政府支持和社会参与为支撑，“学、研、产、政、社”优势互补、协同推进的新型体制机制。

经过十六多年的不懈努力，研究院的影响力显著提升。2016年12月，长江教育研究院成功入选南京大学与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联合发布的首批中国智库索引（CTTI）来源智库，在社会智库内MRPA测评综合排名全国第三（国内教育类第一名），MRPA资源效能测评排序全国第一，位列智库专家MRPA测评综合排序全国排名第2名。同年，长江教育研究院被中国教育智库联盟吸纳，成为“中国教育智库首批联盟执行委员会”成员单位。2018年10月，在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主办的“第一届中国智库建设与评价高峰论坛”上，研究报告《加强制度创新——为中国教育现代化提供重要保障》荣获中国智库资政建言“国策奖”。2018年12月，长江教育研究院再次入选中国智库索引CTTI，位列中国社会智库排名第2位。目前，长江教育研究院正在按照中央关于加强智库建设的13要求，

进一步加强与教育行政部门、科研机构与高校的战略合作，更好地服务于教育改革和发展，力争把自身打造成国内外一流的教育政策研究智库、教育产品研发基地和教育咨询评估中心。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田家炳教育书院）肇始于 1945 年的国立西北大学文学院教育学系。历经西安师范学院教育行政系，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系、教育科学学院、教育学院等发展阶段，2021 年 2 月由教育学院、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高等教育研究与评估中心合并组建为教育学部，是学校成立的第一个集教学与科研于一体的学部，也是学校重点建设的研究型学部。

学部历经近 80 年的发展，在马师儒、郝耀东、刘泽如、朱勃、吴元训、张安民等几代学人筚路蓝缕、薪火相传的奋斗中，构建了本科、硕士、博士一体化的人才培养体系。现有全日制学生 1821 人，其中本科生 690 人，硕士研究生 566 人，博士研究生 529 人，来华留学生 36 人。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国际交流与文化传承创新中取得卓越成就，为国家培养了众多优秀教师、教育管理干部和教育科学研究专门人才，为弘扬和传承“西部红烛 两代师表”精神作出了重要贡献。

学部现有专任教师 101 人，其中，教授 41 人、具有博士学位者 96 人、具有海外学习经历者 52 人。教师中有“马工程”首席专家，国家级领军人才，国家级教学名师，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新世纪百千万人

才工程”国家级人选，特聘教授，国家级青年人才，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全国优秀教师，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宝钢优秀教师奖获得者以及其他省部级人才等35人次。郝文武、傅钢善、栗洪武、陈晓端、司晓宏、陈鹏、李森等教授在中国教育学会、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会、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教育部基础教育教学指导专业委员会等担任重要学术职务。

学部学科专业建设成绩显著，拥有教育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教育博士专业学位授予权，建有教育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有4个本科专业，其中教育学、学前教育、教育技术学3个专业是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特殊教育是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学前教育专业是教育部“卓越教师培养计划改革项目”的承担者。获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10门、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5门、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1门、陕西省一流本科课程7门、陕西省特色线上课程1门、陕西省课程思政精品课程7门；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5项，省级教学成果奖20项；获批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2项，教育部首批新文科项目1项；首届国家教材建设奖二等奖1项；国家级规划教材5部。

学部现有教育部、外国专家局“西部贫困地区农村人力资本培育智库建设”学科创新引智基地、教育部教育立法研究基地、教育部陕西师范大学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陕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西北基础教育与教师教育研究中心”等八个省部级研究平台。学部以国家、区域教育与社会发展重大需求为导向，积极推进有组织科研，整合学术资源，强化大教育学科思维，开展团队攻关研究，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形成了基于教育公平的西部农村教育发展研究、教师职业心理健康与专业发展研究、促进学生发展的课程与教学研究、陕甘宁边区教育史与革命老区教育研究、教育治理与政策供给研究、儿童发展与教育支持研究、数字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研究等七个优势研究领域或学科方向。

学部重视国际交流与合作，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双轨发展路线，通过承办和参加国际会议、合作研究、交换学生、联合培养以及招收留学生等多种方式，先后与美国斯坦福大学、匹兹堡大学、堪萨斯大学，英国爱丁堡大学，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等国外高校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促进了教育学学科的国际化进程，扩大了教育学科的国际影响力。

新时代，教育学部将以“打造西部教育研究高地，跻身国际一流教育学科行列，培养高层次教育人才，服务国家与区域教育发展”为目标，以一流学科建设为龙头，立足西部，面向全国，放眼全球，不断增强对西部教育的辐射力和影响力，力争成为我国西部教育研究的重镇、卓越教师培养的摇篮。

陕西师范大学教师发展学院 (陕西教师发展研究院)

为培养基础教育卓越教师和教育名师大家，充分发挥陕西师范大学教师教育优势和特色，陕西省教育厅与陕西师范大学于2021年11月联合成立陕西教师发展研究院。学校随即建立陕西师范大学教师发展研究院，作为学校二级实体科研机构，与陕西教师发展研究院合署办公。2022年12月，陕西师范大学教师发展研究院更名为教师发展学院，为学校独立设置的二级实体教学单位。

学院（研究院）以全面助力陕西省乃至西部教师队伍高质量发展为总体目标，以培养造就教育名师大家为主要任务，重点面向优秀教师、校园长和教育管理干部开展学历提升和教育培训，针对一线教育教学和教育管

理问题开展实践研究、决策咨询和专业指导，是集高层次教师培养、教师发展研究与高端智库建设、教师专业能力提升服务等功能为一体的综合型教学科研机构。

学院（研究院）内设教育家精神研究、课堂教研研究、教育管理研究、教师发展培训研究、心理健康教育研究等5个研究中心。中心以项目制形式，整合校内外优势资源，依托各类纵向、横向项目和专项项目，开展针对国家教师发展战略规划、区域教师人才资源开发、教师队伍建设策略、一线教育教学和教育管理等领域的理论及实践研究。研究院面向陕西省高校、中小学幼儿园，设立“陕西教师发展研究计划项目”，该项目列为省教育厅“教师教育与教师发展研究项目”序列。

学院（研究院）于2022年开始招收专业学位研究生，现有教育博士研究生497名、全日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18名、教育硕士研究生67名、非全日制教育硕士研究生106名。教育博士生主要来自西部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创新与发展联盟高校、陕西省中小学幼儿园一线教师等，并按照“精准培养，量身定制”原则，实行“一人一计划”的培养机制，所学课程具有“跨学科、跨领域、重实践”的显著特征，充分体现学科领域的交叉融合特色。2023年，学院（研究院）招收“教育学（小学全科）（师范）”专业本科生56名。学院（研究院）还面向陕西省内基础教育一线教师及教育管理人员，计划在教育管理、心理健康教育等专业招收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资格。

学院（研究院）现有教育博士专业学位指导教师60名，其中校内导师53名、校外兼职导师7名，另有来自基础教育学校和教育管理部门的教育博士校外合作导师13名；教育硕士指导教师53名。指导教师队伍中，具有国家级人才称号的7人，具有省部级人才称号的6人。

立足当前，面向未来，学院（研究院）将紧紧围绕基础教育卓越教师培养，坚持高定位、发挥优势、突出特色，加快建设西部教育家型教师和校园长培养的战略基地，着力打造西部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策源地，坚定践行“扎根西部、甘于奉献、追求卓越、教育报国”的“西部红烛精神”，为建设基础教育高素质教师队伍，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作出新的贡献！

2025 西安·长江教育论坛精彩回顾



《教育治理研究》的征稿通知

随着国家对提高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重视，提升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已日益成为教育改革发展的当务之急。为顺应此教育变革大趋势，促进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创刊于 2015 年的《长江教育论丛》已从 2022 年起正式更名为《教育治理研究》，并顺利出版和上线知网。

《教育治理研究》（半年刊）由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长江教育研究院联合主办，致力于成为以教育治理研究为主题和特色的集刊，入选中国人文社会科学（AMI）核心集刊。著名教育家、原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顾明远教授担任本刊顾问。朱永新、徐辉、张力、王定华等一批全国知名教育专家组成本刊编委会。

（一）主编介绍



《教育治理研究》主编 周洪宇

周洪宇，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副会长，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院长、教授。

（二）投稿须知

1. 征稿对象：关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领域的知名学者、教师、专业研究人员、管理人员等。
2. 栏目设置：卷首语、特稿、习近平总书记教育思想论述、教育治理学研究、人工智能与教育治理、教育舆情监测与教育治理、基础教育治理、高等教育治理和有关专题等，出版时根据稿件内容进行适当调整。同时，我们特别设立“青年学者专栏”，致力于发表年龄在35岁左右的青年学者及优秀博士研究生的学术论文，每期力争2-3篇，以凸显本刊特色。
3. 内容要求：选题新颖、数据可靠。鼓励就教育治理领域某一主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篇幅在1万字左右为宜。
4. 稿件来源：全国征稿，匿名三审。投稿信箱为jyzlyj@126.com。
5. 截稿日期：2026年第1期截稿日期2025年9月10日；2026年第2期截稿日期2025年11月10日。
6. 学术规范：请自觉遵守学术规范，勿一稿多投。本刊审稿周期为二个月，二个月未收到回复可另投其他刊物。

（三）体例格式

1. 基本要件：论文标题、作者署名及简介、摘要与关键词、正文、注释、参考文献。如涉及资助项目，请注明项目来源、名称和编号。
2. 论文标题（不超过20字，中英文）。
3. 作者署名及简介：作者署名一般不超过4人；作者简介包括姓名、性别、籍贯、所获学位、任职机构（正式全称）、职务/职称。
4. 摘要与关键词（中英文）：摘要须独立成篇，完整、准确地概括文章的实质性内容；关键词一般不超过5个。且中英文应相互对应。
5. 正文：标题一般分为三级，第一级标题用“一”“二”“三”等标示，

第二级标题用“（一）”“（二）”“（三）”等标示，第三级标题用“1.”“2.”“3.”等标示；图、表和公式均用阿拉伯数字连续编号，如图1、图2和表1、表2，以及（1）（2）等。图和表应有简短确切的题名，图号图名应置于图下，表名表号置于表上，公式号置于右侧。

6. 注释、参考文献：著录格式为“顺序编码制”，采用页下注形式，除电子文献外其余均需标记页码，作者需保证文献的真实出处，如有需要编辑部会请作者提供引文原文。具体格式，参照引用性注释采用《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GB/T7714—2015）。



长江教育研究院是在湖北省教育厅的支持下，由华中师范大学和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发起，于 2006 年 12 月 16 日成立的教育研究机构。由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四届全国人大代表（2003 - 2023），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担任院长。

长江教育研究院本着“全球视野、中国立场、专业能力、实践导向”的指导思想，“民间立场、建设态度、专业视野”的立院原则，聚集了一批国内外优质教育专家资源，搭建了一个以文化出版企业为依托、联系相关教育专家和教育管理部门的平台，形成了以学术研究为基础、政策研究为重点、出版企业为依托、政府支持和社会参与为支撑，“学、研、产、政、社”优势互补、协同推进的新型体制机制。

17 多年来，长江教育研究院一直致力于打造新型教育智库“重器”，努力让智库的“谋划”转化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智库的“方案”转化为实际行动，智库的“言论”转化为社会共识，更好地为改革贡献力量。自 2016 年来，连续三年在中国智库索引评选中社会智库类排名稳扎前三。2017 年入选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2017 年度中国核心智库”。



联系电话 :027 - 87671389

官方邮箱 :cjjy2006@cjjy.com.cn

官网地址 :<http://cjjy.com.cn/>

公司地址 :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青年路 277 号湖北教育出版社 5 楼